

目 录

第一章 缺少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1)
何谓总战略.....	(3)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处境.....	(14)
欧洲的退位.....	(18)
苏俄稳定的总战略.....	(18)
第二章 欧洲的作用和问题	(22)
安全问题.....	(24)
经济问题.....	(31)
西欧的政治范畴.....	(37)
美国的主宰地位.....	(43)
第三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三个地区的问题	(49)
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	(49)
中美洲.....	(58)

近东	(62)
远东	(70)
暂试总结	(76)
第四章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挑战	(78)
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	(78)
美国的赤字是定时炸弹	(82)
关于“世界经济首脑会议”	(91)
东西方贸易	(92)
第五章 意见一致和领导的决心	(95)
缺乏领导	(106)
第六章 对一种“最佳情况”的设想	(108)
跋	(美) 威廉·P·邦迪 (116)
本书产生的过程	(美) 威廉·F·福尔茨 (120)

第一章 缺少一个共同的总战略

本书主要阐述我从十五年国际政治活动经验里得出的一个中心论点，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单纯一国的战略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或者确切地说，在西方世界的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无论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大国，都不能仅仅靠本国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或者获得外部安全。

如果它们不协调安全政策，那么，即使它们采取联合行动，也不能达到它们的经济目标。仅仅通过防务或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它们也不能得到外部安全；它们必须同时协调它们的经济政策。

温德尔·威尔基在大约四十五年前写道：“不实行经济国际主义的政治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沙地上的房子，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军奋战而求得充分发展。”今天，他也

许还会补充说，不仅如此，而且反过来讲也是正确的（即共同的经济富裕也需要有高度的政治合作和相互支持），而且除此之外，这二者还必须有一项协调的安全政策。

小国长期以来一直很明白这种相互关联。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愈小，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强制性就愈大。这一点从比、荷、卢三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公国）的情况来看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无论它们之中的哪一国尝试单独行动，无疑都将遭到失败。布鲁塞尔、海牙或卢森堡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并且认为，哪怕只是考虑一下纯粹一国的经济政策或者纯粹一国的安全政策，那也是不合时宜的胡思乱想。

但是一个国家愈大，往往愈容易情不自禁地唱独角戏。戴高乐将军在法国防务政策上就是如此。而今天，每一个法国人（也包括共产党人）都知道，没有外国的帮助，法国就不能自卫。英国人根据本世纪他们自身的经验也知道，他们没有支援便不能自卫。然而，大多数英国人至今还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走自己的路是可能的，值得反复尝试的。这项政策迄今在英国造成三百五十万人失业，这比五十年前萧条开始之时还要多。

最易受这种单干诱惑的当然首推美国。单独行动的倾向从历史和心理上看根源于美国的孤立主义。这种倾向有时由于对盟国感到失望而益加滋长，有时则因美国力量无与伦比这样一种一帆风顺的意识而变本加厉。二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为其所著的一本书题名就

是《炫耀力量》。

不管怎样，个别的西方国家要在纯粹一国的基础上获得成功，总归都是幻想。没有一个协商一致的、或确实被接受的总战略而想实现共同的政策，这种企图同样是梦幻泡影。

何谓总战略

我所说的“战略”一词是指什么呢？今天，几乎人人都声称有战略。对饮料业经销经理来说就是销售战略，对足球教练来说就是比赛战略，在美国叫做“比赛计划”。经济学家向自己的政府鼓吹经济战略，不言而喻，所有国家都有军事战略，而且三千年 来就一直存在，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从军事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为了避免这一词的不同意义相互混淆，我将依次谈谈对外政策、经济政策以及（从经典的意义来谈）军事战略。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三个方面最终都必然同属一个范畴，无论我们现在把这个范畴简单地称为国际关系，还是用高雅的说法把它称为当今世界的跨国结构。每个国家或每个国家集团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都必须协调一致。简言之，它们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总纲，我所说的总战略（即“Grand Strategy”），就是指这个总纲。

假如我没有弄错，那末“Grand Strategy”的概念是巴·亨利德尔·哈特在大约三十年前采用的。英国这位重要的

作家和思想家原本是军事战略分析家；其后，他把思路扩大到一般的外交政策方面，并得出结论：在一系列国家中，这两个政治领域若不是密不可分的，便是相互关联的。在他的《战略》一书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他的看法，美国读者一定会觉得这个例子相当可信。利德尔·哈特认为：“和平国家往往无意地惹出危险。危险一旦临头，它们又比好战国家更强烈地倾向于做出极端的决断。因为后者进行战争是受利欲驱使，一旦它们发现敌人过于强大，不能轻易战胜的时候，通常会较快地愿意停止战争。犹豫不决的出战者是出于感情冲动，并非经过权衡，因此往往会被一场战斗一直进行到残酷的终局。”

我觉得这个观察很好。利德尔·哈特所描写的战时国家的态度，也有助于说明和平时期美国政策的摇摆倾向。东西方进行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不明不暗的斗争”（约翰·菲·肯尼迪的说法），其斗争方式尤为如此。美国人往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找到干净、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且最好是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在提出战略防御倡议的背后，不是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态度吗？

我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谈到当前的其他问题，不过，首先我想回顾一下现代史，回顾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国家的历史。我认为，这段历史表现出四个相当鲜明的时期，在这四个时期，西方以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奉行形式很不相同的总战略。

西方总战略的四个时期

西方总战略的第一个时期相当短暂，我认为这是同苏联合作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便企图同苏联进行广泛的合作，在旧金山成立了联合国。在布雷顿森林设计了国际货币体系。巴鲁克计划规定，苏联分享美国核研究和试制工作的成果——顺便说一句，这一建议也符合陆军部长亨利·刘·史汀生辞职时提出的要求。最后，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向苏联以及象联邦共和国这样的美国原先的敌人，提供经济援助。

这个时期，美国人很快就让他们的武装部队复员。斯大林不是这样。他既不接收巴鲁克计划，也不赞成参与马歇尔计划。相反，他为苏联的核武器库，不久以后为氢弹、最后为火箭和卫星埋下伏笔。他禁止他的东欧卫星国接受马歇尔计划。他试图干涉希腊，卡死柏林，并对它封锁一年之久。所有这些事件导致西方在哈里·杜鲁门的领导下，于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结成西方联盟。

可见，在那个短暂的第一个时期，西方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提议同各国合作，而苏联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出现了可以简称为冷战和军备竞赛的第二个时期。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任期内，这第二个时期形成了如下特点：在苏联周围组成一个全球性联盟体系。在军事方面，大规模核报复被

看作西方的战略。

与此同时，西方作出了种种自强的尝试。五十年代初曾试图建立一个欧洲防御联盟，结果失败了。一九五七年，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努力导致缔结罗马条约。综观过去三十年，这些努力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这些活动当时受到美国的鼓励。美国当年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居于完全主宰的地位，而美国的经济政策被普遍赞赏和接受。

但是，在这个冷战时期，西方战略的军事部分从来不是没有争议的。将近五十年代末，它也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我还记得一本名为《靠不住的喇叭》的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是美国军界一位杰出人物——当时刚刚退休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达·泰勒。泰勒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原子弹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吹响喇叭，那该怎么办？假如我们有种种顾忌而不能使用它，那又会怎么样？另一方会不会赢得这场冲突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能相信大规模报复计划；因此需要有另一种军事战略，另一种军事结构。

西方有少数深谋远虑之士已在他之前得出了这一结论，还有些人比他稍晚一些也谈到了这一点，即使他们不象泰勒将军那样坦率直言。不管怎样，西方政治家在五十年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一支有实力的德国军队的帮助，便不能保卫欧洲。这导致西德重新武装。分裂的德国的东部小半部分随即跟着进行武装。联邦共和国现在大约有五十万现役德国军人，经过动员，在四天或五天之内能够派一百三十万经过

训练的军人开赴战场。

为什么人们认为必须要有士兵同处于压倒优势的俄国士兵、坦克和火炮进行对抗呢？很清楚，就相互核威胁来说，苏联在此期间将会同美国持平。一九六一年达到高潮的柏林危机和一九六二年的导弹危机证明，这种看法多么符合实际。无论华盛顿还是莫斯科（还是各自的盟国或卫星国）都不愿意为柏林或古巴冒核战争风险——而它们是对的。

由于人们看到苏联和西方都有能力以核武器相互威胁而取得了均势，于是便产生一系列远远超出军事领域的更进一步的见解。一个延续了大约十年（从五十年代末到一九六七年）的重新估计时期引出了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许多人把它称为缓和时期，但我愿意把它叫做在有安全保障基础上合作的时期。

一九六二年，就在这个对力量对比重新估计时期的正当中，约翰·菲·肯尼迪总统在费城发表演讲。对此，在欧洲的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他谈到大西洋联盟的共同结构今后应当建立在两根支柱上——美国支柱和欧洲支柱。

由于日益看到核均势或力量均势已经实现，东西方之间举行了最初的军备控制谈判，并在一九六三年达成第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它结束了大气层的试验。五年后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它是由苏联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谈成的。以后全世界一大批国家参加了这一条约，它们郑重地承担不制造、不购买、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谋求获得核武器的义务。一九七二年由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得了

最大的突破，缔结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从条约上确定战略性洲际导弹限量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尤其是缔结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实际上禁止双方建立当时在技术上有可能的、防止对方战略性导弹的防御体系。

正式说来，西方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在一九六七年底已经开始。联盟的各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以便确定联盟的总战略目标。在当时的比利时外长皮埃尔·阿麦尔的主持下，委员会阐明了双管齐下的指导思想，北大西洋理事会后来把它作为决议接受了。一方面，阿麦尔报告阐明西方盟国决心通过共同的防务努力保证自身安全，以共同的防御能力使苏联不敢发动进攻，并指出这一决心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向苏联提议，在这个有保障的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合作，首先在军备控制方面通过共同商定的条约进行合作，然后也在经济交流方面进行合作。

这个双管齐下的总战略也导致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协定。这一协定使联邦共和国能够在维利·勃兰特任总理的时期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互不使用武力条约。虽然越南战争还在进行，而且欧洲人确切地说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但是，这些协定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反弹道导弹协定一样，还是缔结了。

尽管世界开始出现通货膨胀，这一切还是办到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在于美国为越南战争筹措军费。七十年代初，西方总战略的共同推动力安然无恙地顶住了布

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及美元同其他重要通货之间固定汇率崩溃的冲击。甚至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石油冲击，北美和西欧工业社会大规模失业开始以后，这个共同的总战略继续经受住了考验。一九七三年甚至还取得了巨大进步，当时，英国虽然略有一点半心半意，但毕竟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

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会议构成总战略的这个时期的高潮。包括苏联（作为欧洲国家）在内的几乎一切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和美国参加了会议。把它们列入欧洲国家行列，苏联没有提出异议。赫尔辛基是那个常常被人称作缓和的欧洲合作时期的顶点。顺便说一句，“缓和”一词早在一九六七年关于阿麦尔阐述的双管齐下总战略的决议中，已被北约的正式语汇采纳。如今某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他们错了——他们对现代史就是如此一知半解。

在赫尔辛基会议期间，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一次石油冲击导致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粗暴屏弃支付结算制度。它们差不多全是西方工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势在必行。因此，在赫尔辛基会外顺便决定举行最重要的西方工业国关于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我对此还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我可说是这一套作法的发明者。在赫尔辛基，我们毫无困难地说服了我们的英国盟友和我们的美国盟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随后不久又毫不费力地争取到了日本人参加。这样，使最重要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的尝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

而这是在世界经济包含着各种各样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做到的！一九七五年底，应吉斯卡尔的邀请，第一次经济首脑会议在朗布依埃举行。

这个旨在建立军事均势和合作的总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在一九七六年之后不久就开始消失了。这有如下一系列原因：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扩张，越南共产党人在苏联人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最后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戏剧性的事态发展。美国对阿富汗事件作出反应，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欧洲国家中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和土耳其参与抵制行动。在此期间，苏联在一九七七年初大规模装备西方称为SS—20的新型中程导弹。如同俄国远洋舰队的扩建一样，这很令人忧虑。

总而言之，一九七〇——一九七三年之间同苏联结成的条约网络，没有覆盖俄国人可能采取扩张主义行动的全部地带，而他们利用了这一事实。这些条约涉及双边洲际核威胁，从地理上看，大体上限于欧洲（尤其是柏林），但不涉及（比如说）近东、非洲或中美洲。

这些事态发展，尤其是苏联以SS—20导弹扩充军备，导致西方在安全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对策，即：首先宣布将在欧洲陆地上进一步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然后在四年不见成效的谈判之后开始部署。由于部署潘兴导弹（虽然其数量比SS—20少得多），这一反应使苏联方面忧心忡忡。另外，一九八〇年后华盛顿的某些谈话也使苏联人不安，如关于西方必须占优势的说法（顺便说

一句，我们在欧洲同苏联人一样听得很清楚）。加之，美国的防务预算猛增。一九八三年以来关于星球大战（战略防御倡议计划）的信口开河的说法使苏联更为惶恐不安。

自七十年代后期起，我们处在总战略的第四个时期——也就是重新处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之中。可以说，我们以某种方式又回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我们曾一度经历过的第二个时期。此外，（凑巧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西欧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在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紧密合作，在一九八〇年以后先是由于德斯坦向密特朗交权，随后由于波恩政府更迭，而变得松弛下来。同一时期，第二次石油冲击打击了几乎一切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只有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例外，对它们的影响较小。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失业人数上升到可以同三十年代初和从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的规模，而那在当时曾经产生希特勒夺权那样的灾难性社会政治后果。百分之二十的人失业的时候，失去政治理智的倾向就会在许多人身上滋长。

自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起作了各种同苏联缔结裁军协定的尝试。这种尝试之一产生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条约草案，它虽已草签，但从未批准。既然美国人不想批准，苏联人也不批准。目前在日内瓦作的努力可能获得积极结果。我认为它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机会。鉴于近十年的经验，这已是很高的了，但是，任何人都不能确有把握地预言结果如何。（这一估计是我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晤之前半年在耶鲁作出的，今天仍不需要作任何修改。）今天我们在欧洲仍然处于冷战和军备竞赛以及经济相当困难的时期。

我现在总结一下对苏总战略经过的四个时期：第一，尝试合作的时期；第二，冷战和军备竞赛的漫长时期；第三，以军事均势保证安全，伴以同俄国人谈判和合作的时期；第四，新冷战和重新进行军备竞赛。

从欧洲人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说，从杜鲁门政府直到肯尼迪政府终了的这段时期达到了西方共同总战略的最大限度。在尼克松——福特——基辛格时代也是相当高度一致的，虽然这与其说是西方国家内部关系的特点，倒不如说是西方对苏关系的特点。对苏态度在一九六七年阿麦尔报告后高度一致，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五年（包括一九七五年）极为一致。此后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缓和越来越是个幻想，甚至是自欺欺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苏联人利用它来捞取好处的时期。与此相反，欧洲人把双重战略思想继续看作原则上是现实主义的、适当的。

因此自一九七七年起，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西方共同的总战略日益衰退。西方首脑会晤降格为纯粹电视新闻。美国要求盟国给予不合理的援助。例如，七十年代末要日本人和德国人把美国国民经济从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泥淖中拔出来。美国单方面宣布对苏联实行贸易禁运，先是禁运粮食（十二个月后又予以取消），然后禁运建设天然气管道所需设备（三个月后又予以取消）——华盛顿干这一切事都没

有通知盟国政府，更不用说同它们磋商。

今天我们欧洲人对美国预算赤字的后果感到不安。欧洲人对高水平的实际利息（即从市场利息中扣除了通货膨胀率之后有实效的那种利息）极为担忧。这种实际利息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高的，也是欧洲近代经济史上最高的。其次，欧洲人也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安，因为它加强了那些要求对美国出口给予补贴或对美国进口进行限制的美国人的地位，使自由贸易更为削弱。今天真正自由的贸易还不及世界贸易的一半。大部分贸易要末得到出口补贴，要末受到保护主义的进口限制。再次，欧洲人对欧洲的存款、资本和信贷大量流入美国感到不安。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成了外国存款、外国资本的最大纯进口国，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弥补预算赤字。

这一切丝毫没有在盟国政府之间进行过见效的商谈，没有摆脱世界经济混乱的共同战略。（这一论断在西方五国财政部长会晤以后仍然有效。应美国之邀，这次会议于一九八五年秋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由于美国中央银行改变了政策，日本中央银行改变了对美元的干预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大大降低了——是否暂时地？——美元的汇率。）美国人认为，世界处于经济高涨时期，这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确，美国经济相当繁荣，但世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拉丁美洲适如其反，欧洲各国国民经济（概无例外）停滞不前，这很大部分应当归因于欧洲人不能负责的高实际利息。

即使在军事方面，盟国政府也不是相互和谐一致。欧洲

各国政府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很为担忧。它们不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因为它们不愿意在苏联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它们同自己最重要的盟国进行着严重的战略争论。但是，巴黎、伦敦或者波恩的每一个人以及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十分了解，联盟内部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没有根本的一致。欧洲和远东的每一个政府也都知道，即使战略防御体系有一天成为现实，也绝不会为远东或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保护、更多的安全。用这种保护美国领土的防御计划，绝不会增加（可能反而减少）西欧和日本的安全——对于东盟各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是如此，因为它们间接地依赖于美国和西方从总体上形成同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均势的能力。

由此可见，西方今天远远没有取得政治上的一致，远远没有在实际上奉行一种共同的对外政策、安全政策或经济政策。我已经指出了由美国的政策产生的困难。但是，目前的局势也受到欧洲人的做法的消极影响，欧洲没有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那份责任。这个有关欧洲的问题我要深入探讨，但现在先谈一谈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处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小国，大小相当于美国一个中

等的州，例如俄勒冈州和科罗拉多州。但是，在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只有二百万至三百万人，而西德有六千万人口。鉴于这样的人口密度，武装力量在这个地区的集中当然具有重大意义。

我已经提到，我们自己有大约五十万军队，此外还有美国武装力量二十万左右，还有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的军队——在德国甚至有一位丹麦将军。所有这些军人及其武器系统的最高指挥权都属外国。试想，如果俄勒冈或科罗拉多有六支非美国的、最高指挥权属于外国的武装力量将会如何！试想，如果外国统帅在俄勒冈或科罗拉多有五千枚左右核武器归他指挥，而不受东道国控制，又将如何。谁考虑到这一点，他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德国有好些年轻人，甚至年纪较大的人，如教授、主教，抗议这样一种共同的军事结构。我不属于“和平运动”，对它也无特殊好感，但是我很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担忧。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忍受七个国家军事力量如此集中地驻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一切都听命于外国的总指挥。

我住在汉堡，我如果坐上汽车向东驶去，大约四十五分钟就到了所谓“铁幕”。如果人们放我通行，那么我还需要三十分钟就到达俄国坦克兵营。反过来，俄国部队只需要一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到我家。苏联飞机只需要几分钟就飞到汉堡上空。试想，如果俄勒冈居民有七支不同的军队、五千枚外国核武器驻在自己领土上又该如何——而且俄国人就在眼前！

指出这些情况是要说明联邦共和国的处境，使人比较容-

易了解，为什么生活在潜在战场上的人，不象远离苏联、生活在美洲大陆的人那样冷静地对待军事威胁和狂言妄语。在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只有美国兵，没有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荷兰的、比利时的部队。但是，如果那里有这样一些外国部队和武器，那么美国人也许就稍为容易理解联邦共和国的“绿党”运动。这个运动是第二次冷战开始以后，在大规模长期失业开始以后平地升起的。

欧洲的退位

为了回到整个欧洲问题上来，我想清楚讲明以下一件事实：鉴于经济困难已形成很大负担，欧洲各国政府在发展共同的国际政治纲领或制定西方的共同战略方面，或多或少地已停止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同苏联谈判中程导弹（包括一九八二年著名的“林中散步”）、战略防御计划、太空反导弹防御，还是所谓战略物资贸易、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欧洲人都或多或少地不去扮演积极的角色。关于一九八五年底里根——戈尔巴乔夫首脑会晤内容的准备也是如此，虽然这次会议必然触及欧洲的利益。

我认为这个状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但目前事实是这样。与此同时，欧洲人担心地观察着美国的事态发展，观察着五角大楼、国会山或白宫的动向。一个美国人说得很中肯：“欧洲人不怕会出个骗子手，倒是怕出那样一个诚实的

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也许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日本举国有一种类似的不愉快情绪，即使不是那么突出。过去十五年，日本人在经济上比美国或者欧洲好得多——主要是日本人的防务开支只占其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而我们欧洲人的这项费用占我们每年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五，美国甚至更多。相对少的防务预算使日本人有很大的经济活动余地去增加资本投资，提高生产率，他们也很机灵地一直这么干着。他们找到了养息、繁荣经济的安逸环境。另一方面，日本人在战略防御方面仍然完全依赖美国。按照战后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施行的宪法，他们不能建设自己充分的防御武装力量。实际上，朝这个方向每推进一步都遇到这整个地区的强烈抵抗。中国、两个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它们都会起而反对。日本在本地区没有亲密的朋友或盟友。它只有一个盟友，而这个盟友（美国）却相距很远。

南朝鲜的处境与此相似，在这个地区没有朋友。朝鲜人象日本人一样依赖美国。东盟各国更是如此。今天并没有这样的事干扰欧洲人，但是我不得不说，欧洲对美国最近发现所谓太平洋盆地感到某种不快。据说，太平洋盆地正在成为美国地理战略思想的中心点，甚至成为地理战略活动的中心点。

关于对华政策，我在第三章还要详谈。至少自六十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政府就执行了一种始终一贯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说早在“中国”一词在美国还意味着台湾的时候，就

已如此。因此，欧洲人欢迎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但是，自那时以来我们对美国的远东政策的某些方面有点猜不透。我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经常施加压力是特别成问题的。

苏俄稳定的总战略

对苏联的态度，自然地构成西方一切协调一致的总战略的基石。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最重要之点是苏俄总战略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由此产生的连续性。要想知道莫斯科大公国在五百年前，在伊凡三世或伊凡四世（雷帝）之前是何等之小，不妨查看一下历史地图。再看一看欧洲地图，比如三十年战争末的地图：当时莫斯科已扩展到濒临太平洋。在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俄国向南方遥遥伸展，它把波兰的残余部分也吞并了。俄国不停地扩大着、扩大着：从西方一个老的德国城市（柯尼斯堡，现在叫加里宁格勒）直到东方的堪察加。一段时期它甚至把阿拉斯加也纳入自己的版图，沿着太平洋海岸，势力深入今天的美国，直达旧金山以北两三里的俄罗斯河。一位很灵敏的美国人花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人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这是俄国人自愿退出所占领土的一个少有的机会。

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期，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集中俄罗斯的土地”闻名的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占领外国的

土地，然后使居民俄罗斯化。俄国的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执行、甚至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种谨慎地、但却不断地扩张的总战略。同在关于苏联的理论著作和书籍中可以读到的一派胡言相反，莫斯科的总战略四分之三是由传统的俄国战略，四分之一是由共产主义战略组成。对于安德烈·葛罗米柯这样的人来说（他在前不久被提升到大概不那么重要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之前曾担任外交部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一直是推行俄国总战略的一个手段。意识形态的神圣卫士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想法当然有所不同，但是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战略都有意见分歧。在苏联，传统的和历史的动力一直压倒意识形态的动力。

如果这种扩张野心五百年来即已存在这一点是准确无误的话，那显然就必须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读者一定会记得，“遏制”（containment）一词是美国一位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提出来的。我毫不怀疑，遏制俄国的扩张必定仍将是西方总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邻近“铁幕”、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俄国人近旁生活的欧洲人，设法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这方面有压倒俄国的意图。我们决不会这样，我们既不想使他们害怕，也不想发动一场相互恐吓的斗争。我们也不想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我的家乡汉堡市一千多年来靠海上贸易为生，诺夫哥罗德许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之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其他一些城市也是我们的贸易伙伴。

直到近四个世纪，我们的对外贸易重点才转向了非洲、亚洲和美洲。

在文化方面我们也一直相互接近，美国人也如此，虽然他们并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能设想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的音乐会可以没有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我不能设想世界上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人，他是文化界的行家里手或研究十九世纪的文化，却又不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屠格涅夫、戈果里或今天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俄国人对我们的西方文明作出了许多贡献；反过来，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对俄国人的文化也作出了贡献。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促进使我们欧洲人希望，这种邻居关系可以继续保持，猜疑、恐惧和敌意不会增长。为此，大多数欧洲人和欧洲各国政府（不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都愿意对俄国人重新采用我在上面论述过的双重战略思想。他们一方面要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便在俄国的压力、讹诈或侵略面前能获得安全感。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安全的基础上，欧洲人要同俄国人合作。此外，正是这种双重指导思想，对匈牙利人、波兰人、东德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再适合不过了。这样一种西方总战略将使他们有较大回旋余地去自主地决断、自主地发展。相反，东西方在欧洲的两极化越严重，东欧国家的自由就越小。而它们目前正受到大陆分裂之苦，自由本来就很有限了。

西欧人今天对他们最重要的盟国和朋友在总战略中表现出的深思熟虑程度是很为怀疑的。他们看到美国近几年的战略不稳定、不连续，这使他们忧虑。另一方面，看起来欧洲人丢弃了自己的、十分自然的兴趣，不想正式参与制定西方总战略。

在最后一章我要回到下面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来：美国能不能单独确定并执行西方的总战略？如果能，能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这样一种尝试本身就不合时代，因而毫无希望？

第二章 欧洲的作用和问题

欧洲在前几年显然已不想再参与制定西方的总战略。这一舍弃正发生在紧张关系加剧，又一场冷战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标志的时期；这种作法再清楚不过地显出欧洲的孱弱。欧洲在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工业和军事上至今仍然拥有巨大潜力，但是这种潜力闲散着，因为没有领导——既没有对外的共同领导，也没有对西欧国家之间合作的领导；既没有由一个国家领导，也没有由某一个领导人物进行领导。诸如此类的领导都是可能的，但是目前并不存在。

对于那些焦急地期待欧洲进行真正合作的人，我愿意提醒他们，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年多一点，而且二百多年都说同一种语言，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却长得多。意大利在两千以上，法国一千多年，波兰整整一千年，德国一千多年多一些，英国一千年。所有这些国家，一千多年以来都用不同的语言。文化的分化过程长得不可想象。要在翻手之间，

甚至靠某一位政治家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就跨过千百年的遗产，那是绝无可能的。

大概要过许多年，欧洲人才能实现欧洲联盟。我是个务实主义者。我一向认为关于欧洲问题的种种信口开河的议论是不足取的。我怀疑我在有生之年会看到欧洲联盟。欧洲人的紧密合作倒是可能实现的。这种合作将会使欧洲人有能力拒绝那些对欧洲有害的美国观念。

如果美国人认为，对美国好的东西也总是对欧洲有好处，那他们就错了。对欧洲好的，未必对美国也好。对日本好的，不一定就对美国好。而对美国好的，不一定对日本好。首先人们要清楚了解本国的利益。但是，除此之外人们也必须准备同伙伴、盟友或朋友的民族利益妥协。这样做的前提是，有关各方都坦诚相见，但今天不是这样。

在我的心目中，西欧绝不是一蹶不振的。但我必须承认，欧洲由于缺少合作和领导，目前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日益丧失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个人说过：“无为很有益。但不能无所事事。”欧洲人在过去几年干得不多，但他们不应当过分。

欧洲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近几年，不得不忍受政治影响的丧失，原因究竟何在？鉴于不但老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且还出现了新问题、未来的问题，这些原因能否消除？在我们向着二十世纪末叶接近，展望遥远未来的时候，欧洲及其对世界政治作用的前景如何？

我将分三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军事和军备控制；第

二，经济和财政政策问题；第三，历史和政治范畴。

安全问题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苏联政策的扩张主义进攻方向，对此加以概述之后，我不打算详细说明苏联具体的军事威胁及其潜力；我只是提请人们记住欧洲受到军事威胁的几件主要事实。

第一，苏联在军队数量、坦克、火炮、作战飞机、火箭、截击机等等方面比西方占优势。就兵力和武器数量而言，在苏联和欧洲的大西洋海岸之间不存在均衡的武库。

第二，如果我们不只是考虑中欧战场上现有的部队，而且也考虑到苏联后方的大批可以动员的后备部队（在十四天之内就可以把他们送上战场），那么不均衡状态就更为严重。西方拥有的后备部队无疑少得多。美国和英国没有兵役制，这两个国家根本不可能动员起值得一提的后备力量。就象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它们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建立起后备军。虽然法国和联邦共和国有大量后备人员，但是法国却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包括后备人员）撤出了北约军事联盟。因此，在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后备人员方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均衡状态。

第三，自七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新的威胁，即SS—20和SS—22导弹。尤其是SS—20中程导弹目前拥有大约

一千枚分导核弹头；同时还有几千枚近程核武器，它们全都指向西欧的目标。西欧只有法国和英国的数量有限的核武器，同苏联不计其数的核武器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此外，美国拥有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二三百枚核弹头，另外还有大约五千枚射程短得多的核武器，它们几乎完全部署在德国领土上。

换句话说，在核武器方面，在潜在的欧洲战场上没有美国组成部分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均势。这种情况今后也不会变化，因为欧洲各国（除法国和英国之外，但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署并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了不购买、不生产、不拥有核武器的义务。

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苏联投入所有可以动员的后备人员，延长了用常规武器进攻的时间，应该如何保卫西欧？直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二年提出雅典方针，或者确切地说，直到一九六七年正式修改北约的原则之前，战略答案一直是这样：假如苏联发动进攻，就施行“大规模核报复”。一九六二年麦克纳马拉看到，这个战略不能再沿用下去，至迟自一九六七年起，联盟的其余成员也同意这一观点。既然西方联盟自己都认为这个战略不合适，在俄国人看来它也就不可信了。自一九六七年起，联盟的正式战略叫“灵活反应”。意思是力图争取至少两三天时间（我希望有两三个星期）用常规防御抵挡住俄国人，但以后西方相当早地转为首先使用所谓的战术核武器。（我着重说“所谓的”，是因为这对生活在这个战场上的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来说实际上是致命的武器。把只杀死美国人和俄国人

武器称为“战略”武器，把只杀死波兰人或德国人的武器称为“战术”武器，对这种术语我本人是极为反感的。这些概念是美化一经大量使用就会使中欧大部分人民非死即残的那一类武器。）

一九六七年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及早首先使用”西方核武器这一战略所有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有人提出了这种战略能否为受害最大的国家接受的问题。自己住在加利福尼亚或佐治亚的某个人也许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欧洲军事战略。如果你住在中欧，你就不那么容易（其实几乎不可能）接受这一战略。

从欧洲的立场来看，我认为，能否接受的问题（或者说，自己的战略必须是人们要保卫的那个国家可以接受的原则）是应予考虑的六个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之一。这六项原则是美国人能够赞同而且应该赞同的。

1、第一项原则是威慑原则。威慑不是二十世纪的发明。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懂得，以弊大于可望获得的利的恐吓使可能的进攻者望而却步。

2、第二项原则是可信性原则。一定要使敌人相信，人们确实会把恐吓付诸行动。这是今天我们的全部核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西方对我们的军事战略的可信性怀疑多几分，我们的恐吓的可信性在苏联方面就少几分。

3、第三项原则，我管它叫我们的防御战略所要使用的手段的相对性。关于什么是适度的问题（或者说，有多少可以够了）的辩论，变得较为严肃、较为重要了。今天，这

个问题所起的政治作用比一九四五年以后西方前几个战略时期的任何一个时期要大。

4、第四项原则在于经常不断地重新评价，因为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修正我们的评价。正如北约头三十五年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有时重新制定了军事战略，我们今后也会这样做。

5、第五项原则是均势原则或双方大致同等安全的原则。这一原则导致双方努力达成军备限制协议。这一政策始于六十年代末，在七十年代头五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自那以后没有新建树。一九七九年拟就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美国未予批准，因此俄国人也没有批准。过去十二年进行的其他一切军备控制谈判，在维也纳和日内瓦的不同谈判桌上都失败了。军备限制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如下一些问题：今天什么是适当的？明天适当的又是什么？我们如何实现均势？我们确定或找到了均势以后，如何稳定均势？协定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较小的国家也一样）都不会签署对于对方比对自己更有利的协定。当然，另一方也不会签署给我方的好处大于给他们自己的好处的协定。可见，按照事情的本质，均势的原则是双方之间达成军备限制协定的一切努力所固有的。指出这一点是简单的，但要懂得并接受它，对于一些政治家来说显然是很难的。

6、因此，最后还有可以接受性这个第六项原则。这是

同第二项原则（可信性）紧密联系的。今天，我们的军事态度和我们的意图确实日益被人怀疑。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舆论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它。无论是在我们的国会（美国参议院、德国联邦议院、英国下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大学、自视为专家的那些人，还是在广大公众之中，我们的舆论的许多方面经常提供不大乐意接受的新证明。

这表现在人们提出了冻结核武器的各种建议，包括要求单方面冻结，不赞成首先使用战略或“及早首先使用”战略。围绕部署“潘兴—Ⅰ”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争论，也说明类似的情况。最后，关于对里根总统战略防御计划的分歧也属此类。

总之，无论对于我们的公众还是对于我们的政治家及我们自己的政治骨干，西方当前的军事结构和军事战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下面一点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假如我们不能说服我们自己的公众、我们自己的议会，那么我们就会冒风险，会被苏联方面十分危险地误解和错误地估计——这一错误估计关系到我们一旦遭受讹诈或侵略，或我们的边界遭到侵犯，我们实际上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自己的争论和怀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误解为请求采取行动。

这样，可以接受性和相对性问题在今天成了欧洲安全问题的核心。只有在我们自己接受这个战略，在我们各自的国家没有不接受这种战略的、需要认真对待的分歧意见的时候，我们的战略才可取信于人——并且今后仍然是可信的。现

在，既然公众已经意识到了所有这些问题，我敢预言，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甚至在下一世纪，西方再也不能通过一项不为我们自己的公众接受的军事战略（或军事结构）。他们不接受的原因是，这种战略看来不可避免地要摧毁我们所要保卫的东西。

既然及早首先使用核武器是生活在潜在战场上的那些欧洲民族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军事战略，那就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造成一种不必及早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形势呢？怎样才能造成让苏联去决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形势呢？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建立常规武装力量的均势——要么扩大西方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削减，象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二十五年前提议的，而且参议员萨姆·纳恩今天还在提议的那样），要么东西方就双方均衡的武装力量达成协议，然后（但愿如此）就双方武装力量削减到一个较低水平达成协议。为争取达到这一目标，在“共同均衡裁军”的名义下在维也纳谈判了十二年多仍一无成果。达成共同均衡裁军协定的希望在目前不很大。

在美国，看来许多人相信，要做到能够自卫，必须为防务尽可能多花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正确。假如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苏联的常规武器优势，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增加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开支，而是需要我们这方有适当的兵力和常规武器。最重要的是必须能用常规手段自卫。

这里首要的是士兵，而不是金钱。其次是我们士兵的

动机，也不是钱。再其次是我们士兵的教育、军事训练和能力——这也不是金钱问题。占第四位的东西（靴子、枪支、车辆、坦克和装备这些士兵的其他必需品）才真正要花钱。

人是最重要的，这不仅是从实际作战经验的实用意义上说的，而且也是从伦理和哲学的意义上说的。我相信，保卫民主，抵抗外国暴力，不能依靠志愿兵或雇佣兵，而应当让每个公民都理解，他要想有一个可靠的防御，他自己必须为它献身。在越南战争期间滥用了兵役制原则，我理解许多美国人的这一观点。但是，随后干脆取消兵役制，这条摆脱内政分歧的出路过于简单了。西欧大陆各国都没有走这条路。它们都保存了兵役制，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要个人作出的牺牲远远大于花费纳税人的税金。

因为欧洲大陆各国保持了这个有政治困难的方针，而美国放弃了这一方针，所以我认为，美国批评欧洲国家的防务开支所谓太少，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扬言削减驻欧美军，迫使欧洲各政府多拿出钱，我认为是更不合法的。

显而易见，美国在短时期内将不会改变它的军事思想方法和它的轻重缓急安排。因此，欧洲人自己必须考虑自身的处境。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妨碍着欧洲有效地加强防务。如果法国让它的常规武装力量和后备队参加西方防务的共同组织，那末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就会轻而易举地实现西欧和苏联之间令人满意的均势。那时经过动员之后，就会有

大约十八个德国师，十五至十八个法国师，还有比、荷、卢几个师——总共将近四十个西欧师以及一些英国部队。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当然该由一位法国统帅指挥。

欧洲当前形势下一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是，在美国统率下的几十万欧洲军人反复被告知，他们不能很长久地打胜仗，西方就会被迫使用战术核武器，结果是他们的家乡会遭到毁坏。

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糟糕的情况，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即：法国政治领导对战略问题的估计，还处在压倒一切的戴高乐精神阴影的笼罩之下，怎样说服他们迈出我所建议的那一步呢？戴高乐相信，法国一定能独立行动。同时他希望（但他没有公开说出），其他欧洲国家在保卫欧洲（也包括保卫法国）方面会承担起主要负担。但是，只有在法国人决定采取新政策的时候（比如说，美国毕竟可能从欧洲撤退，迫使法国只得如此）才会有额外的预算资金购买必要的武器、车辆、火药等等，以供那时可以动员的后备队使用。

经济问题

在美国报纸上时而可以看到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某种报道，欧洲十二国之间的确也存在这类东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此期间作为正式成员确实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是，仔细观察，这并非真正是一个“共同”市场。

法国电话电报局不买德国的电话，英国铁路局决不会买法国火车车厢，德国联邦铁路局不会买英国火车头，如此等等。虽然应当有一个共同市场，但它实际上并不十分“共同”。在这个三亿多人的市场上，既没有共同的税收制度，也没有共同的技术规范。十二国甚至没有协调的税收政策。除了布鲁塞尔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和农业政策有相当少量的预算之外，各成员国既没有共同的预算范围，各成员国财政部长也不推行协调的预算政策。

没有共同货币，甚至十国中央银行也没有协调的货币政策。七十年代末在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同倡导下创建的欧洲货币体系，构成货币方面共同行动的开端——但是目前各国政府踟蹰不前，没有完善这个制度，没有使它成为国际信贷市场和国际货币网中的一个有力因素。

实际上存在的主要是一个共同的农业价格制度和农业收入政策，而且是一项荒唐的政策，丝毫不比美国的农业政策好。这项政策消耗了布鲁塞尔欧洲当局整个预算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也许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欧洲共同体中共同农业政策占主要地位，这是大约三十年前共同体成立之时在罗马条约中已经犯下的错误造成的。结果是各国部长年复一年为欧洲农民收入的差别争吵，争吵时间比争论其他任何一个问题要长。

但是，农民只占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而目前欧洲失业者占百分之十一强。这引起的问题比农民的收入问题要大得多。这超过百分之十一的失业者的问题，目前还看不

到共同的解决办法。于是自上次石油冲击以来，好些国家政府转而做有限的努力，企图在纯粹一国的基础上减少本国的失业问题。

比如法国就是这么办的。一九八一年春密特朗总统就职的时候，法国有意改变政治方针以便推行“赤字开支”政策。法国领导遵循传统的凯恩斯原则，以为这样就能造成额外需求，满足这种需求就会带来商品生产的提高，从而创造或保住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这一目标，但主要地是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创造和保持了工作岗位，因为他们的企业供应法国市场商品比国有化的法国企业要灵活。法国自己所得到的主要是一贸易收支和经常性项目收支的巨额赤字。不到两年，法国政府不得三次将法郎贬值。此后它就放弃了“赤字开支”政策。法国失业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

英国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几年来，撒切尔首相企图推行一种严格限于一国的、面向供应的经济政策，但是结果比法国人更明显不利。英国的失业人数及其百分比比法国更高。

第三个例子是荷兰。荷兰企图仿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荷兰的出口大多数输往那里。德国是荷兰最大的、最重要的市场。但是，在试图仿效德国的货币政策时，荷兰自己却落得了超过百分之十六的失业。另一方面，意大利实际上一有需要就印钞票，因此它的通货膨胀率是欧洲最高中的一个。联邦共和国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一直稍好一点。这里从未有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是，德国的经济效能自一九八

一年以来绝不是令人满意的。

尽管有这一切问题，欧洲三亿三千万人从潜力上看是一个非凡的市场。欧洲共同体的人口数大大高于美国。虽然美国的人口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四倍，但仅德国一国的出口总额就同美国不相上下。从这一点可以清楚看出欧洲的经济潜力。德国的出口总额甚至大于日本，虽然日本的人口多一倍。这里根本还没有把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计算在内，它们（以及还有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也一样达到了巨大的出口额。

要了解欧洲旧大陆在世界市场中的巨大潜力，就必须看清这一点。但是，一些欧洲国家推行一国的经济政策，而不推行共同的经济政策，这种徒劳的尝试是不合时代潮流的。自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第二次石油冲击以来已作了种种试验把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国范围内结合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了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有必要而又有可能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以下三个不同的步骤至少是可以设想的：

第一，我们无疑可以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以便通过规模更加大得多的批量生产来降低成本，获得盈利。例如，我们可以把各国政府及其机构的招标以及国营的股份公司的招标，名副其实地大笔一挥就变成一项真正的欧洲的事情，变成对欧洲每一个人都真正开放的竞争的对象。这是不难做到的，而且很快就会使各个国家的私营与国营的各种公司加强合作。

第二，我们可以立即加强欧洲货币体系。这不需要必须经过批准的条约，而只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甚至是中央银行之间的一项协议就够了。这样做会使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较为趋向一致，这是各个政府不同经济政策趋向一致的重要部分；要知道，这些政府为避免本国货币被迫贬值或升值，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换句话说，目标就是协调有关政府在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经济活动，在货币方面，或者说在这个市场上通用的货币方面，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市场。

你从纽黑文到纽约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钱。或者你从纽约到奥兰多，从那里到贝弗利希尔斯，然后再到西雅图，沿途一直通用同样的钞票。欧洲就不是这样，这里每一条边界上都必须换钱。一些欧洲国家执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其他一些国家又不时改变它们自己的货币政策。我们离美国内部或日本内部那种真正的共同市场还十分遥远。日本人在一亿二千万人的市场上使用单独一种货币，美国两亿三千五百万使用单独一种货币。而我们欧洲人，三亿多人竟使用十一种货币！

加强欧洲货币体系也会使欧洲共同体这一机构能够经受美国经济政策（“混合政策”）即法国人所说的主宰经济，在目前造成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是迄今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是超凯恩斯主义的“赤字开支”，这二者的结合在美国造成了全世界最高的实际利息。在近期内，加强了的欧洲货币体系将有助于欧洲同美国的政策分庭抗礼。同时，欧洲货币体系的这样一种加强是要达到在世界最重要的通货

(美元、欧洲货币单位和日元)之间建立一种鼎立关系。

第三个(较为困难的)步骤是，欧洲人就共同的经济结构政策取得一致，以便适当改造欧洲经济，使它能够在量和质上重新充分增长，促进它的竞争能力，恢复高度就业水平。欧洲经济结构比美国的更加面向资本、货物和设备的生产。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鲁尔河畔，所谓老的烟囱工业所占的百分比要比美国(包括匹兹堡、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在内)高得多。

在欧洲工业中重工业所占的部分太大。欧洲工业迫切需要改造，迫切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在越南战争期间有过的巨大的钢铁需求将不会再回来。越南战争期间以及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同其邻国之间的剧烈冲突时期对船舶和吨位的极大需求也不会再来。苏伊士运河重新通航以来我们几乎不需要四十万、五十万吨的额外油船。欧洲不需要多余的造船和钢铁生产能力，而需要现代的、有发展希望的工业和经济部门，无论是在新技术还是在劳务方面。在高技术方面，欧洲肯定需要一个共同的研究和发展计划。

密特朗总统不久前提出了搞一些共同的大项目的一系列建议，例如把欧洲一些首都连结起来的高速火车网。这种火车行驶速度同东京和大阪之间或巴黎和里昂之间的火车一样快。英国和大陆之间海峡下的隧道现在应当造起来。宇航和通信方面的一些共同的、私人的项目也是完全可以办的。例子不胜枚举。既然欧洲人不能象美国人那样把防务预算大量地用来促进民用工业部门的高技术，他们别无他法，只好借助

于共同的项目来取得可以相比的成果。密特朗以“尤里卡”为名提出的欧洲共同努力发展高技术的倡议，同前已提到的例子一样，指出了相同的正确方向。

当然，问题是，最近会不会实现我提出的三项倡议中的一项。困难在于，目前的欧洲国家政府大多数对问题没有紧迫感，也缺乏想象力。在至少还有点这种意识和略有想象力的地方，又没有实现的决心。而在可以看出这样的决心的地方，却没有能力。欧洲今天总起来说缺少政治活力。

西欧的政治范畴

某些读者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国家不能象一个大家庭那样生活？我的回答是：它们有些企图，它们确实作了这种尝试。但是，战争时期一些民族恨其敌人，和平时期他们有时恨其亲友。欧洲国家有时不明白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美国有时不能理解欧洲国家大家庭的行为，那末这只表明，我们相互是多么相似。但我承认，要弄清楚目前阻碍欧洲发展的障碍，即使对于欧洲人来说也绝非易事。

既然我们刚刚谈到有时候朋友也相视如敌，或者确切地说象是民族主义的对头，那么我应当再加上一句：西欧各民族（可以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东欧其他人也一样）今天感到相互之间是朋友，虽然他们经历了千年之久的

战争和敌对。从这个角度说，欧洲的形势比远东或近东的条件远远要好。在那里，相互不愿作真正朋友的民族简直太多了。欧洲的总体情况同近东、远东或东南亚的总体情况相比，确实存在着天渊之别。

例如，最近在法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问：“您认为谁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三分之二的多数回答说：“德国人”。在德国作同样的民意调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德国人回答说：“法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三十年前，这两个回答还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在某些方面人民比他们的政治领导取得的进步要大。

应当承认，我是一个相当偏爱法国的德国政治家，虽然我不会说法语。（我同法国朋友谈话时讲英语。）

我不是一向都偏爱法国。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差不多三十年前，当罗马条约提交德国议会批准的时候，我弃权了。因为尽管我相信欧洲一体化的必要性，但我当时确实认为，没有英国的经验和英国的实用主义，欧洲共同体绝不会成功。

此后三十年，我屡次失望，但也有过一些正面的经验。有一件令我失望的事是，我看到，英国政界优秀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成员（无论来自政界右翼还是左翼）、白厅几乎没有一个女人和男人认为，横隔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大西洋比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海峡要宽（当然，爱德华·希斯是个例外，但他离任已十二年多了。反对党的行列中还有少数几个例外）。

总起来看，我终于得出了这一看法：英国人不是真正愿

意与欧洲其他国家休戚与共，在这一点上戴高乐将军是正确的。以西欧一体化而言，英国人从来没有听从过萧伯纳的忠告。他说过：“那些奋起寻找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如果找不到就去创造它的人，才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前进。”英国人只有在他们不能阻挡这个俱乐部取得成功的时候，才会参加这个俱乐部（这听起来如果有点不客气的话，我请英国人见谅）。

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我起初是个偏爱英国的人，但是上述经验以及约翰·菲·肯尼迪总统给我的强烈影响，使我在政治上成了偏爱美国的人，或者如同人们当时在欧洲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但是后来，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美国大西洋派伙伴的失望，更多是由于我日益深入了解我国的地缘政治处境，我在最近十五年或十八年终于成了一个偏爱法国的人，一个坚定主张优先发展德、法友谊以及法、德之间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紧密合作的人。

我已经描述了德国领土上的军事形势，提到了联邦共和国具有的战场特征。在这里我还应当稍许谈一谈许多法国人和其他西欧人不完全理解、至少没有十分清楚看到的事。我是指德国人的民族个性受到严重心理创伤。以暴力分裂一个民族并不能创造两个民族。这能毁掉一个民族。但在德国这样的情况下，它使这个民族受到严重创伤，而不是毁掉了它。东德人和西德人内心深处都盼着统一，希望将来某个时候再次欢聚一堂。

谁也不应当有任何幻想，不要以为德国人不会象波兰人

那样执着地追求。波兰人被分裂将近一百三十年之后又实现了统一。此后不久，他们又被斯大林和希特勒分治，但他们一直还是向往着一个共同的国家，并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下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德国人也将会如此，虽然他们知道，在目前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存在这样的机会。但下一世纪的某个时候他们可能达到目标——尽管可能是在下一个世纪晚期才会达到。

同时，我们德国人知道，俄国人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邻居——一个强大的邻居。而且是很近的邻居——苏联的战斗轰炸机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向汉堡市投下炸弹，如果向西推进，苏联装甲师先头部队离德国西海岸只有一小时路程。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人是我们的邻居；而且因为他们还将继续如此，所以我们德国人想同他们建立正常关系，同他们和平相处。把一个相距遥远的国家说成是“恶人帝国”是容易的，但这个国家若是近邻，用词就须要多加小心。坦率地说，我们和其他欧洲人因此而不愿意用这样的语言。

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防备我们的俄国邻居——我们必须能够保卫我们自己，以这种能力使俄国人望而却步，不敢对我们的边界作任何侵犯。德国人非常了解，他们不能单独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伙伴和盟友。在德国的西部有大约六千万德国人（东部约一千六百万），而苏联拥有二亿六千万人。

尤其是在欧洲内部追求德国的利益，只能视法国人卷入的程度以及对德国的立场支持的程度而定。另一方面，法国

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巴黎和法国，人们认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经过若干世纪连续不断的发展，法国扮演国际政治角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五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些跟从法国领导的朋友和盟友，就不能有声有色地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尽可能紧密合作，是既符合法国的利益，也符合德国利益的。如若单枪匹马，两国都太小，无论是在目前对付两个大国（包括东方不友好的邻居和西方友好的盟国），还是在将来对付正在崛起的、在本世纪末将有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都不具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谈法国和德国的时候，不应当忘记这两个国家的共同历史。它们无数次兵戎相见，如今才愿意结成至交。这是一件大事。在对法国的关系方面，德国地位的实力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地缘政治处境的奇特。近几百年来，它的邻居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除外）。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处在如此一个小洲的正中，被这么多的邻居包围着。这是战争如此频仍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德国人打出了国界，有时候是来自北方的民族（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诺曼人）、或来自西方（路易十四领导下的法国人和拿破仑）和东方的民族（匈牙利人、土耳其人、俄国人）入侵了德国。但是破坏性最大、罪恶最深的战争是德国人进行的，他们在希特勒的指使下企图使四邻臣服。

德国的这种地缘政治处境以及它在苏联的军事战略思想

和在西方的军事战略思想中作为战场的作用，使得西方感到绝对有必要让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上面向西方，并紧密地维系于西方。要是这个联系纽带断裂，那就意味着西方遭到一个极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可是，从长远来看，只有法国支持德国人，把他们同西方连结在一起，他们才能够留在西方这一边。大陆欧洲的这个核心国家不是通过一位来自佐治亚洲、加利福尼亚州或美国其他一个什么州的美国总统而系于西方，它只能通过西欧人，尤其是法国人的纽带维系于西方。

法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还是密特朗，都懂得这一点，并把这种必要性当作他们的政策的根本。但是，法国人至今还不理解，他们终久不能要求德国人承担法国对东方防务的风险，除非法国也无保留地、明显地参与这些防务努力。法国只有参与承担风险和实际防务才能领导德国。法国只有在军事领导中也担负一种积极的角色，才能担负政治领导。而这种军事领导是以参与共同的军事努力为前提的。

只要法国不愿意迈出这一步（鉴于戴高乐主义的情绪在法国的战略思想中至今仍占优势，这是不易做到的），德国人就将继续把法国人当作他们最好的朋友，而不当作最重要的军事盟友。相反，他们将继续把这个角色分派给美国。

使这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区的国家紧密地维系于西方家庭或西方联盟，这肯定符合西方的普遍利益，也同样符合德国人（包括东德人）的利益。为了防止哪怕只是一个欧洲国家

成为俄国霸权主义的牺牲品，或者为了防止苏俄常规武装力量优势（由于德国的中立化或分裂）赢得份外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今天已毫无疑问，西德事实上已真正地、持久地同西方连结在一起。德国对此没有怀疑，外国也没有理由抱有怀疑。但是，西欧既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经济单位（主要由于英国人的踌躇），也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防御单位（由于法国人的踌躇）。

美国的主宰地位

显然，欧洲未能扩大自己对美国的独立自主。特别是近几年，自从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克服了心理上的软弱，情况看来恰如其反。在临近本世纪末的这一时期，美苏两极世界可能逐渐朝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力量三角转变。但是，欧洲目前好象无意参加有美国、苏联，不久也会有中国参加的那个最高级的国际竞赛。

大多数西欧人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观察世界，因而一直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两千年来，历史就是从欧洲中心的角度撰写的，而欧洲人并没有丢掉老习惯。他们难以理解历史也在别的大陆演变，就好象美国的报纸读者常常感到难以理解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大陆上文化和历史也在发展。

当然，尽管欧洲有这些弱点，人们不应忘记，欧洲仍然

是一个战略上重要的地区——一个对于苏联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确实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但是，要等到欧洲人将其分析性思维摆脱民族分化过程的影响，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个过程长达许多世纪，造成了语言、哲学和宗教观、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政治态度的差别。

这将需要许多时间，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当忘记，美国人也同样易于以我为中心。美国现在越来越严重地存在着极力维护本国利益的倾向。鉴于美国的活力和实力，目前美国几乎是一片陶醉情绪，这反映在美国的军备政策和军事政策上。但是，这种态度令欧洲人不安，欧洲目前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此作出的反应。

西欧人想摆脱美国，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同时又力不从心；我说的这种情况更适用于东欧国家同莫斯科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幅描绘美国和西欧之间关系的讽刺画。

我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事件说明这种情况，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是件小事，从苏联的角度看也是件小事。但是，从欧洲的角度看却是重大的。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和秋天。当时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日内瓦举行限制欧洲中远程核武器会谈。我的朋友保罗·尼采是美国的谈判代表。欧洲任何一个人都不特别热衷于在自己的国土上增加核导弹——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也无此热望，无论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东德人也好，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西德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也好，更不用说英国人了。但是，关于部署核导弹的决定却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我们

为此定了四年期限，美国曾许诺在每个阶段都进行密切协商。

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尼采在日内瓦市郊同他的苏联伙伴作著名的“林中散步”时，为中远程核武器会谈的军备限制协定制订出了一个妥协公式。即使现在我也会立即接受他的公式，因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妥协。但是，莫斯科和尼采自己的华盛顿政府却不进行任何协商，甚至对自己的盟友不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拒绝了这一妥协。在此后几个月，这件事公之于众之后，美国公众几乎都没注意到这件事。但是，它却引起西欧民主政府的深为不满和恼火，在东欧各共产党政府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反应。

这一事件表明，如果西欧人感到必须防备美国的政治霸权，那么他们并不是大谬不然。SS-20导弹毕竟首先同欧洲命运攸关。这些导弹不能打到美国，但却瞄着西欧，就好象部署在西欧的美国导弹是针对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俄国西部的目标一样。

在日内瓦举行限制中远程核武器谈判期间，美国承担同其欧洲盟友密切磋商的义务，这是一九七九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重决议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结果推动了限制中远程核武器谈判。在这项决议中，一些欧洲国家（法国除外）承担了义务，万一谈判失败，最后允许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美国新的中程核导弹。美国在拒绝妥协方案前全然没有进行磋商，无疑是美国采取的一个独断专行的行动。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意味着一个类似的沉重打击。根本

没有同盟友举行任何协商，里根就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开说，战略防御计划是为了“改变历史进程”，并通过建立弹道导弹无法穿透的最后一道屏障使战略核武器成为过时。他无疑打算改变迄今商定的核战略及其所包含的核威慑。

防御敌人的核导弹的想法从事情本身来看当然并不新鲜；无论美国还是苏联，最近从六十年代起都在反导弹武器方面进行研究。一九七二年它们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就严格限制这些武器系统的数量取得了一致，以便限制军备竞赛和保持相互威慑的均势。

如今，所有这些都突然被说成是过时了。这至少是总统的目标。这似乎也是在说，法国和英国的核武装力量今后会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宣告似乎包含着预算重点由常规防御向导弹防御转移，这样，苏联常规武装力量对欧洲的威胁在发展趋势上还会进一步增大。

即使在几年之后的现在，用战略防御计划能不能对苏联的战略导弹达到哪怕是差强人意的防御，还是完全不清楚的。除了美国导弹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增加防御外，是否还可以有效地保护其他什么东西，这还要十年时间才能够一般地作出判断。在欧洲各国政府看来，战略防御计划不大可能增加本国人民的安全。这种怀疑态度同指向欧洲的导弹距离近有关，尤其同无人驾驶的地形跟踪的作战飞机或者巡航导弹（陆基巡航导弹）已经形成的和将要形成的威胁有关，任何未来战略防御计划体系都不能对付这种导弹。

另外，欧洲人也知道，俄国人不会因为花费巨额开支来对战略防御倡议作出军备技术上的回答而在经济上被打倒。俄国人担心自己的经济势力削弱的前景，但是，他们一定能够跟得上美国人，也许在时间上只是稍迟一些。他们将会干脆让本国人民多吃一点苦，以便能够把更多一份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但是，欧洲政府对经济战丝毫不感兴趣，它们重视的是均势和稳定。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政府试图把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强加于联盟的企图已使欧洲盟友感到吃惊和深深不安。国防部长温伯格紧接着迫切要求盟友在六十天内赞同这一计划，那只不过是登峰造极的一步而已。

美国也许能侥幸地做最近一次专横独断的尝试。但是结果可能同一九八〇年粮食禁运和一九八二年天然气管道禁运相同。在这两件事情上，欧洲人既然都未受邀进行协商，也就干脆拒绝参与，因为他们不相信贸易战，贸易战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华盛顿在宣布这两次禁运之后不久又不得不予以取消。

欧洲没有领导的决心看来简直是挑动美国人来进行控制。但是，华盛顿缺乏国际经验的人控制过多，正在削弱着欧洲对联盟最重要成员的信任，因而也削弱对联盟本身的信任。

欧洲陷于困境，它具有潜力——在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工业以及军事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但没有利用起来。没有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是西欧内部没有领导。这种在增进

合作的道路上必要的领导可以来自几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国家，也可以来自一个卓越的人物。我曾劝告美国人不要失去耐心；他们应该避免匆忙使用象“欧洲硬化症”这样含有贬意的概念。

在美国的比较短暂的历史上，它的领土从未驻过外国军队。它同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不同，从未受过失败的创伤或者必须作出灾难性的牺牲。由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有生气。另外，美国人（从出生之时起，或者是经过教育）是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主义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有时未免有些天真，因为由于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变得多多少少审慎多疑了。但是，美国的乐观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相当有益的。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对美国不仅有根深蒂固的好感，而且对它时而表现出的优越感也抱有几分谅解。但是，如果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忠告的话，我想说：在历史的当今时刻，美国不应该过于露骨地显示它以为具有的优越性；而应该听从雅典的贤哲修昔底德的忠告，他说：“雅典人丝毫不反对一个人聪敏，只要他深藏若虚的话。”

美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在涉及美国的“总战略”（或者用亨利·基辛格的说法叫“地缘战略”）时，西欧及其受过良好教育、勤劳和有独创性的人仍将是西方力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欧洲对希望保持自己真正的自由与和平的美国来说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章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 三个地区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利益，如同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样，远远超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所确定的共同防卫的地理区域。但是，盟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了哪些好处而追求它们的全球利益呢？它们对这些有时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地区的政策，在多大范围内能够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呢？我想以三个不同的地区为例，研究这个问题。

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

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方唯一的世界大国以来，它就发现，从战略上看，它是面对两大海洋的大国。然而，需要有朝鲜和越南的战争以及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近十五年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才使美国人完全意识到

太平洋在它的“总战略”和全球观点中所占的地位。尽管一九六二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才懂得，它是一个面对三大海洋的大国——就是说它也深深地而且无法解脱地卷入了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和加勒比海的事务。

这种牵连不仅涉及连接南北美洲的陆地桥梁——墨西哥、古巴、尼加拉瓜、厄瓜多尔以及加勒比盆地，而且也涉及拉丁美洲整个四亿居民（到下个世纪初那里的居民就将接近四亿）。拉丁美洲今天已经是（将来更加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大的集聚地，说同一种欧洲语言（确切地说是两种相近的欧洲语言）的人的最大集中地。虽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在上个世纪初就被“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和别的民族领袖从欧洲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但是它们世世代代一直受少数寡头政治的阶级统治。

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处在落后和文盲状态，大多数人受剥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些国家的人民无论何时谋求解放，独裁政权或军人政权总会建立起来，然后使国家平定，经济顺利发展。这些国民经济主要是海岸经济，内地是落后地区。

这种形势正合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的贸易伙伴的胃口。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最近才开始由独裁统治形式转向多党制或民主制（例如阿根廷、巴西和秘鲁），但是，由于贫困和动乱，所有旨在实现国家民主化的运动目前都处在危险之中。贫困和动乱又导致外国干涉，它要末用共产主义的渗透以及用古巴和苏联的武器转运掩盖着来进行，要末以北美洲

的实际上很难掩盖的“隐蔽行动”或军事威胁来公开地进行。

这一地区一贯的不稳定局面无疑具有全球战略涵义。美国、罗马天主教、欧洲各国（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西方世界的私人银行以及苏联都很不愉快地注视着这一出正在展开的戏。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整个西方还是美国都没有为拉丁美洲制定出一个总战略。这样一个战略首先必须帮助拉丁美洲人在自己的历史遗产、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由和经济富裕的向往的基础上弄清自己的命运并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

这样一个总战略的第二个重要目标应该是，共同确保这个大陆和整个自由世界经济之间紧密结合的、正在扩大的经济联系。从短期来说，就是逐步解决拉丁美洲目前的债务问题，从而也预防对华尔街、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大银行的隐患，最终预防对自由世界所依赖的整个银行和信贷体系的隐患。

第三，必须有这样一个总战略，它消除苏联直接或间接干涉的危险，从而消除战争危险。这一地区如爆发战争，可能不象福克兰群岛和格林纳达冲突那样容易在地理上加以限制。它多半会扩大。

要弄懂目前拉丁美洲经济一团糟的情况，就需要回顾一下上一个十年的情况。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两次油价暴涨时，南美许多正在取得明显经济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非石油生产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它们大多必须在国外买石油。例如巴西，没有石油也没有煤。这

些国家进口石油必须付美元，从一九七二年到现在，以美元计算的石油价格涨了二十倍。这些国家始终是通过出售咖啡、糖和香蕉赚取硬通货。但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过去二十年只涨了一倍，而且谁也不想购买比以前更多的糖或咖啡。我们今天不会多喝二十倍咖啡，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咖啡里放进多二十五倍的糖。

因此，这些国家靠出口赚的钱不够支付油价暴涨后的石油费用。所以它们不得不借硬通货去弥补它们贸易结算中的巨额赤字。在第一次油价冲击后的这段时间，美元流通资金足够用来提供信贷，因为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国家积累了巨额美元盈余。西方的银行系统和西方各国政府发明了所谓的“石油美元再回流”。

这听起来是很好的，并且在一段时间里是乐善好施和建设性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欧佩克国家把它们多余的美元短期存在西方银行里。这些西方银行向巴西、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但这些银行和政府没有认识到，虽然它们在短期的基础上提供了信贷，可是事实上这些信贷已发展成为长期信贷。这些贷款如三个月后不能偿还，就不得不延长，并且要为以后的三个月提供额外的贷款。再经过三个月，这些贷款又不得不延长，并再为第三个三个月提供新的贷款。因此，实际上形成了长期信贷。每次提供新资金时利息都上涨，这是由于美国的利率在提高。

一九八二年八月，墨西哥成了第一个无力拿出到期款项的受害国家，墨西哥政府认识到了马克·吐温说过的真理：

“银行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在出太阳时借给你雨伞，一下雨就要把它讨回。”不仅墨西哥如此，而且所有其他国家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这种境地，包括东欧和非洲各国政府。西方的银行家不得不认识到，借债人无力归还这把伞，也就是说无力归还借款。他们连到期的利息都付不起。于是世界才明白过来，人们面临着一场普遍的债务危机，而且这危机不限于拉丁美洲，虽然集中在拉丁美洲。

当欧佩克国家不再把石油美元积存西方时，形势就更为严重了。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沙特阿拉伯从它在国外的帐户上提取了高达三百亿左右的美元，以便为庞大的国内计划的以后阶段准备资金。这些计划是在第一次石油价格暴涨后以为财富会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开始执行的。沙特阿拉伯不能再积攒石油美元了，因为油价不涨了；相反，过去两年由于世界的经济萧条，由于全世界石油消耗减少，因而减少了石油进口，油价下跌了。这样，关于石油美元的神话结束了。

拉丁美洲的预算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引起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及相当多的资本流入西方工业国家，也同样使拉丁美洲的情况糟糕透顶。一些国家的政府敦促本国的国民经济采取严格的节约措施。削减预算、减少对生产设备的投资、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甚至出现饥饿，这些都是节约计划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一位拉美国家总统几年前对我说：“不久我将不得不决定，是向国外的一些银行汇划利息重要呢，还是养活我本国

人民重要。”他说这些话是非常认真的。当然，他那种说法是目光短浅的，因为如果他不再付利息，他就再也不能得到新贷款，以后他为日益增加的人口进口食品时是需要那种贷款的。他后来出于这种理由决定劝说本国经济界采取节约措施，以便能支付利息。这一决定也有利于法兰克福、伦敦、特别是纽约市的一系列银行。这些银行如果得不到利息是会倒闭的。尤其是美国的银行，如果它们在九十天后得不到利息，就必须从资产表上扣除没有收回的债权，或者必须严格地更正价值。总的说来，它们放出去的遭受危险的信贷大大高于它们的自有资本。

归纳起来，拉丁美洲经济一团糟有四个原因：第一，石油价格暴涨；第二，美元利率大幅度上升；第三，不负责任地加速向外国私人银行借钱；第四，几乎所有的私人银行不负责任地发放贷款，对这种贷款我们的中央银行、我们的银行监督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西欧、北美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很明智地加以控制。

当然，自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的最低点出现以来我们看到在处理危机方面有了很大进展。若干重要负债国每年的对外经济赤字明显减少，有的变成了贸易盈余——起初是由于奉行节约政策（它使进口减少了），最近是由于扩大出口，满足美国因预算赤字而出现的大量需求。整个债务的增长放慢了；公家和私人的大量债务作了重新安排，这首先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总干事雅克·德拉罗西埃的细心和预见性，也由于私人信贷银行提供了合作。

所有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里我必须引用亨利·基辛格的一句话，“……我有这样的印象，即目前的债务处理办法已经山穷水尽。”许多重新安排债务的协定必须每十二个月就打开来重新谈判。昨天满以为商妥的条件，今天就必须重新谈判。一些放债的银行在这方面采取的做法完完全全是以赢利为宗旨的机构的做法。但是，不断进行放宽债务的谈判的必要性以及利率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情况，使得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不能真正事先计算出他的国家在以后十二个月里要向外国信贷银行汇划多少硬通货；对十二个月以外作出预言就更不可能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债务国调整经济方针，这些调整基本上是合理的，但不一定考虑到这些债务国的国内情况。过于严厉的节约措施会导致内政的动荡，而这又会诱使军人重新夺权。

总起来看，首先是世界经济的根本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我们自己的错误，导致了无节制地借债。就是说，整个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拉丁美洲人。如果把问题的主要责任推在他们身上，那是不公正的，也是极不明智的。

可是，美国和西欧在这方面现在只推行一种面向国内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债务危机给他们的银行和信贷体系造成了严重问题，而不把它看作影响非常深远的某种事情。美国公众的很大一部分仍然认为美国相对地独立于国际经济的发展，美国的政策仍然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同世界经济，特别是同国际金融体系融为一体

的。

阿纳托尔·卡莱茨基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对目前形势的描写，我认为是中肯的：“迫使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这样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每年都取得巨额贸易盈余，这样一种政策难道能够看作是长期、持久地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吗？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二年之间，如果巴西和墨西哥想支付利息，同时只借极少的贷款或根本不借额外贷款的话，那么巴西的年平均贸易顺差就必须达到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墨西哥必须达到百分之七。”

长期达到这么高的顺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贸易顺差甚至比日本的还要高！巴西或墨西哥怎么能超过日本的出口盈余呢？它们显然是做不到的。卡莱茨基还说：“如果世界经济增长率降低或者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上拉美为本国的消费必须动用更多的资源，那么世界很快就会面临一场新的危机。”我认为，这种判断是十分中肯的。

我觉得，重要的是所有有关国家立即就一项共同的战略达成一致；这种战略必将要求几乎所有方面同时作出牺牲，债务国应当及早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并遵守同该组织商定的计划。但现实主义的调整计划必须把债务国国际收支的持续改善同经济的重新增长结合起来。为实现这一点，债务国应当设法从国外吸引更多的私人直接投资，并为外逃资本的返回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对于债务国来说，如果不能预先计算出它们在以后

十二个月内应当支付的最大还本付息额的话，那它们在政治上是不能承受的。为对付不断波动的利率，它们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种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不受普遍欢迎，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今后仍然在于通过谈判为那些面临国际收支问题或还本付息问题的国家拟定调整计划。

做这样一些规定是自然的，否则就不会有新的信贷可供支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全世界债务国唾骂很是令人遗憾。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是不对的。它们的态度使我想起了把一切罪过推给一只雄山羊的古希伯来人。这种替罪羊原则既不是新鲜玩意儿，也无济于事。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困难负责，从而使这个组织失去作用，这帮不了它们的忙。那样，它们根本就再也得不到信贷了，因为私人银行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议定的切实的基本经济条件来提供一定数量贷款。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达到某种程度的节约。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使这种节约超过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中期调整所绝对必需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这一点就等于向己方球门踢进一个球。

采取这种协调的办法，对债权国和债务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状况来说将是一种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变甚至也还不够大。整个西方也可能不得不制订一个新的方案。我想把它称为“贷款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to Lend”——这个名称同“借款总协定”即“General Agreement to Borrow”相对应，后者溯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开始阶段）。

这样一个总协定的核心是，最重要的债权国政府承担义务，支持债务结构的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至少能在债务国能够自助之前减少它们的负担。其中可以包括把短期债务改为中期的有固定利息的债券，从而代替目前每年重新安排债务的做法。也可以把每年还本付息的总额限定于债务国出口收入的一个商定的最高百分比上。新的协定甚至可以包括一定数额利息的资本化。这些办法为债务国减少负担，出现亏空首先要通过补助加以弥补，债权国应在同一项协定中承担提供补助的义务。

私人债主银行也应作些贡献。它们应提供新的贷款；它们应为那些诚心诚意地保证履行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妥的计划的债务国降低利息；这些银行也必须同意协定中关于限定债务国到期本息归还额的条款和办法。

提出这样一张措施清单虽然容易，但要各国政府理解其必要性就难多了。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国家政府要比华尔街更理解这种必要性，但是，迄今为止欧洲国家政府宁肯把活动场地让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欧洲人或多或少持谨慎态度——政府和业务银行都是这样。美国政府也如此；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最近公开接受了这种想法的一部分。

中美洲

我深信，欧洲各国内对拉美各国内政问题的理解常常

比华盛顿好些。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些问题同欧洲历史类似的程度大于同北美历史类似的程度。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偏见影响了美国的判断：除少数外，美国在传统上倾向于支持拉美那些保卫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财产和经济利益、强调法律和秩序的政府，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保住这些政府不倒台，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进行干预。这在许多拉美国家引起了反对美国佬的感情，特别在加勒比盆地。在许多中美洲人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对他们本身来说主要意味着剥削和依赖，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有吸引力。

拉丁美洲今后的发展，据我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必要变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与苏联不一样，美国在那里有极端重要的利益。从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联也对美国仍然困在中美洲战场上感兴趣；因为把全世界的注意力从苏联的（例如在阿富汗的）实力政策上引开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但是，苏联有一天可能有兴趣利用中美洲的反美情绪，并以此破坏美国同欧洲的关系。苏联希望能从形势的恶化中捞到好处，目的是输出共产主义，干预中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在那里赢得政治影响。

只有谋求同美国合作才能实现该地区的和平和经济进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条公理。违背美国的意志什么也做不到。但是，解决问题的主张必须来自该地区本身。

因此，欧洲国家现在集中力量支持中美洲的或与之毗邻的五个国家的倡议，这五个国家以孔塔多拉集团著称。孔塔

多拉进程在过去三年里发展缓慢，但这个集团提出的建议是有成功希望的。不管这些建议有什么样的缺陷，除了以比美国迄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热情去注视它以外，看不出有别的选择。

西欧人对中美洲的和平解决办法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如果问题得不到和平解决，那么欧洲同拉丁美洲之间良好而密切的传统关系在欧洲看来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美国作为西方领导大国的可信性也会在西欧很大一部分公众的心目中受到损害，这会额外地增加欧美关系的负担。欧洲人还担心，中美洲爆发一场战争（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并会横向发展升级，引起苏联或古巴作出反应，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报复行为也决不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美洲政治形势相当紧张的现阶段不应当有任何外来的干涉——既不应有古巴的干涉，也不应有苏联的干涉。但是，把我们局限于一种纯军事的战略上是不合时宜的：从长期看，中美洲的危险不可能通过实力政策或军事方式加以消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积极的经济战略，以便改善那里人民的令人压抑的状况。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中美洲，也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尺度来衡量一下：现在，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加在一起的社会总产值还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比西欧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只多一点。总共不到三百亿美元，而美国的社会总产值是三万亿美元，欧洲共同体为二万亿美元。用我们的经济手段

去改善这五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可能的。制订一个“里根计划”，使它们的人均社会总产值在七年或十年内比现在实际提高一倍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美国公众和国会对基辛格委员会的经援建议所作的犹豫不决的反应表明，那里对这样一个项目是不太热情的，虽然是美国方面首先开的头。如果邀请欧洲参加一项确实是共同的计划，那不就会补充进一个新的、重要的因素吗？我肯定，欧洲各国政府对这样一种为中美洲共同提供财政援助的计划，要比对美国叫它们把预算资金集中起来搞星球大战的研究的要求热情得多。为中美洲搞一个由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人出钱的共同的马歇尔计划或里根计划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有益的副作用，即消除拉丁美洲人始终存在的关于美国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力图在该地区建立势力和统治的怀疑。

与此相联系，应当对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天主教会的作用说一些话。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对教皇坚持保守的神学表示理解，我不想批评他。我也理解他反对所谓解放的神学或革命的神学的斗争。但是，这只是必须做的事情的一个方面，一个消极的方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发展天主教会近百年之久在中美洲所主张的那种社会学说。鉴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产业工人的困苦，教皇发表了一个伟大的社会通谕《革新之后》，在那以后四十年，即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时又发表了一个伟大的通谕《在第四十年》。这些通谕和天主教会的另外一些通谕在过去九十年里对欧洲发展一种理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从这种传统看，南美的主教们——同北美和欧洲的主教们一样——和罗马的主教召集他们的专家研究一下拉美状况的复杂性（而不限于描述贫困！）将是适当的。如果主教们有权在核时代教导世界上的人们维护和平，那么他们更有权提出新的想法，说明可以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以便从基督教的立场去保护拉丁美洲的人的尊严，教导各国政府对邻国采取基督教的态度。如果天主教会仅限于反对一切生育控制，从而促进人口的爆炸，那是根本不够的——而且会损害天主教会本身。

近　　东

过去几年，某些美国人用衰退这个词形容世界的经济形势，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已达到了萧条的程度。两次石油冲击以来的经济萧条提醒我们，几乎整个欧洲（英国和挪威除外）、日本和许多别的国家都依赖于波斯湾和近东的石油。仅仅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的原因，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便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

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墨西哥、中国和苏联都有自己的石油，而且有些国家还有天然气和煤。但日本人和欧洲人以及大多数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根本没有石油。他们依赖畅通无阻的石油进口，依赖近东不受阻碍的石油生产，依赖自由的、连续的海上运输，依赖足够的石油数量以

及合理的国际油价。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美国。是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及其邻国间的战争引起了欧佩克第一次石油冲击。因此，当日本人、欧洲人和许多美国人听到来自近东的坏消息时首先想到的是石油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由此首先想到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形势。西方世界的一些工业家希望多销售些武器。一些银行家首先想的是他们的阿拉伯顾主的存款。东西方国家的外交部和国防部里的计划司则把近东看作一个前途很难预卜的地区，但它的变化很容易引起全球实力均势的变化。同广大公众相反，这些司里的有经验的人知道，近东的特点不仅在于有围绕着以色列的冲突，而且也在于它是一个由冲突、谜团和秘密组成的、几乎无法解开的、很难看透的复合物。

先谈一下该地区的边缘地带，然后谈中心地带。在以印度教信仰者居多数的印度和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之间关系相当紧张。印度现已研制了核装置，它可改为军用，巴基斯坦并不比它落后很远。印度依靠巴基斯坦的北方邻国苏联，巴基斯坦则依靠印度的东方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夹在上述四个国家之间的是阿富汗，它自一九七九年底以来一直被俄国占领着。苏联人奉行沙皇在上一世纪就推行的老的扩张方针，以求把阿富汗置于他们的控制或影响之下。苏联现在已在阿富汗建起了一些机场，它们离波斯湾相当近，也就是离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相当近。

苏联人显然在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向波斯湾的暖水域或印度洋的暖水域。苏联在世界的这一产油区已拥有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基地。它甚至在埃及也曾有一个基地，直到一九七二年安瓦尔·萨达特才把它赶了出去。但在这以后它又在别的国家以更有力的地位出现，例如在叙利亚。苏联人也到了也门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前亚丁，到了埃塞俄比亚。此外，苏联人同利比亚的卡扎菲也关系密切。

美国也在近东保持着军事和政治存在。美国同沙特人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同埃及的合作要广泛得多，并且也包括经济上的合作。美国同以色列有一种战略协议，这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人民来说意味着美国也是这里的一方。一些阿拉伯国家从这种格局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绝对不能导致近东的和平。

当然还有以色列同其阿拉伯近邻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埃及不断发生的冲突。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通过萨达特及戴维营会晤形成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约，没有扩大到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一九六七年以前属于约旦、现在为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复杂问题仍未解决，有着世界上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地的耶路撒冷，它的各种问题也没有解决。

出于这些原因，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口头上的一致性（埃及在缔结了戴维营协议后被开除了，但目前它希望能被重新接纳）。此外，存在着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口头上的团结。对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是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个世界圣地。因此，对该

城市和地区的宗教上的担忧至少是一条团结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强大纽带。

另外还存在着巴勒斯坦难民的压力，这些难民现在生活在其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他们是聪明的、能读会写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埋头苦干而节节高升，现在在那里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在某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中，这些难民在那里的官僚机构和国民经济中的存在引起了担心。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管其目前的兴旺首先是由什叶派方面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造成的，还是后来由伊斯兰逊尼派激起的。伊朗所拥有的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潜力特别令人担忧，当然，苏联的存在也使人有理由感到很大的不安。尽管作了这么大量的列举，但远没有近乎完整地把近东的紧张形势描绘出来。

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供应西方世界石油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着海湾的石油运输。两伊战争涉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利益，这两个国家在秘密地进行干预；但被卷进去的不仅是这两个国家。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在为自己的自由斗争；他们有的生活在伊拉克，有的生活在伊朗，有的生活在苏联，还有的生活在土耳其。作为一个分散在四个国家的民族，他们想重新生活在一起。谁也不能控制围绕伊拉克这块（相比而言）小小的冲突地区发生的事件，但它不过是二十多个冲突地区中的一个！

以拒绝阵线（即那些拒绝和诋毁戴维营协议的国家）的

领袖自居的卡扎菲，其政治行为谁也不能预测，更不用说控制。利比亚居民很少，但能拿出的剩余石油美元却很多，卡扎菲用这些钱在近东各地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他使苏丹尼迈里地位朝不保夕，他干涉乍得，他扬言要对埃及进行渗透。

在纳赛尔领导下，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曾经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仍然是伊斯兰的教育中心，它的精神影响甚至远达苏联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朝东达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由于萨达特的重大的和平倡议，西奈半岛归还了埃及；但也由于这一倡议，埃及被迫放弃了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萨达特（我曾对他怀有深厚友情）对于和平的必要性和可以实现性笃信不疑。他与纳赛尔相比，阿拉伯人的味道少一些，埃及人的味道重一些。他被谋杀说明了所有“温和的”阿拉伯领导人都面临着危险——包括两岸各城市的阿拉伯市长，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必须并且愿意同以色列军事政府合作。

埃及面对着巨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日益加剧的人口过剩而变得更加严重。埃及的全部用水都来自苏丹。所以苏丹的政治态度对在开罗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有极大的重要性。他不谋求当阿拉伯的领导（他是个谦虚的人），但谋求同阿拉伯国家重建正常的外交关系。应当用这种观点来评价他同巴解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会晤。

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为了使同以色列和希蒙·佩雷斯的

谈判合法化，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西岸的阿拉伯领导人似乎需要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他们容忍阿拉法特通过这些会晤提高声望。只有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反对阿拉法特，因为阿萨德看不出同以色列谈判的必要性。

叙利亚绝不是苏联的傀儡，但它相信总能得到足够的苏联援助来对付以色列的突然袭击。阿萨德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去作叙利亚直接控制黎巴嫩的尝试。他有一天也可能向鼎阿拉伯领导权。但是，他没有石油，他穷。他不仅比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穷不知多少，而且从他的资金来看甚至不允许他同卡扎菲的财源充足的外交较量。至于沙特阿拉伯，它不想束缚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利雅得是十分谨慎的。

中东各国政权几乎都易受伤害。英迪拉·甘地和安瓦尔·萨达特的被谋杀以及巴基斯坦总统和伊朗总理的被处决，还有简直没完没了的、遍布各地的恐怖活动，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黎巴嫩的例子尤其突出。那里有六大宗教集团，十七个官方承认的教派。它们玩弄强权政治，相互欺压，它们频频挑起内战，势不两立。它们有的受叙利亚支持，有的受伊朗支持，还有的受以色列或西方支持。此外，黎巴嫩还有正规的叙利亚部队，有联合国的代表，还有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三年的直接军事行动也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美国临时的军事存在也同样一筹莫展。

与此相比，附近塞浦路斯的形势要简单得多；这里只有两个主要对手，即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虽然双方都是北大西洋联盟成员，但联盟迄今对解决这些问题无能为力，或者至

少不能找到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安卡拉和雅典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大削弱了北约的南翼。

我并不试图全面描绘中东的形势，我只是想举出足够数量的例子说明这一地区的复杂性。我认为西方和美国不可能为这一动荡地区的问题找到能导致稳定和平的“解决办法”。只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才会相信这一点。

苏联被赶出一个国家，它又会在另一个国家冒出来，谁也阻止不了这一点。总的说来阿拉伯人宁愿信赖美国人而不信赖苏联，但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政策是亲以色列的，他们对此感到失望。许多人愿意同俄国人交往：离苏联越远的阿拉伯国家越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也就是让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进入国内。

无论美国的、苏联的（以及还有欧洲的）政治家，一刻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即似乎他或别人有办法解决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问题，或有办法解决石油丰富的、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同激进的运动和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对近东政策的改变的次数比它对其他任何地区的政策的改变次数都频繁，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因为这些努力没有一次长久见效。莫斯科的政策比较谨慎，苏联人能插进一手便感到满意。

欧洲人迄今的做法比较灵敏一些，他们大体上奉行了一种不干涉政策。他们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从来没有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排除在外——也没有排除石油输出国组织或它的任何一个下属组

织。同时应当看到，两个欧洲国家，即作为虽非正式的、但可说是名誉的欧佩克成员的英国和挪威，直到不久前还从欧佩克的价格政策中得到相当大的好处。欧洲人完全知道，在战争中他们是不能保卫波斯湾周围的石油产地的。他们能同美国一起做的事情至多就是采取严格限定的行动，例如向黎巴嫩派法国的、意大利的或英国的和平部队。

假如有一个疯子，一个恐怖集团，或现在在海湾北端打仗的两国（伊朗或伊拉克）中的一国决定点燃和炸掉海湾周围的油田的话，事实上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保卫波斯湾的石油。没有人能使世界免遭这样一种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我们所能做的莫过于在一桩桩冲突中按具体情况把我们的份量稍稍从一方移到另一方，以便保持平衡，防止灌木林火变成森林大火。甚至可能出现西方必须同苏联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形势。

以为美国在近东推行一种“总战略”就可以解决那里的全盘问题并导致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国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过时的。这使我想起了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一句话，他说：“理想主义的产生首先同本身远离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一地区的最后一次持久和平是由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它建立了一些强硬的政权并到处部署军队。美国现在不能这么做，尽管它拥有洲际的战略破坏力量。它甚至未能通过出动常规军事力量把美国人质从德黑兰解救出来，而以色列人在解救被劫持到黑德培的飞机旅客时做到了这一点，德国人在索马里，在有利得多的环境下也做到了这

一点。

人们最多只能抱这样的希望，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缓和爆炸性的局势，制止战争，此外就是继续推行美国人（其中有亨利·基辛格）长期来在近东推行的细心的心理外交。再抱更多的希望就是幻想了。当然，细心的外交也要求美国人和那些在近东有传统影响的欧洲国家合作，即同英国、法国、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同西班牙，还有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合作。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苏联人在这一地区同样有影响。他们也怕波斯湾发生战争。但是，他们打算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这迫使西方进行遏制，也迫使西方克制。我们可以认为，近东如发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其后果对苏联人、对我们都是没法估计的。

远　　东

不久前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目前主要是在忙于实现所计划的经济改革。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五、六年成功的试验之后，现在他们正在把这种改革扩大到城市和城市工业。

但是，北京也肯定有战略上的忧虑。中国人对苏联感到不安——对亚洲的SS—20导弹，对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加强，以及对苏联在越南岘港和金兰湾的军事基地感到不安。当然，中国人也对阿富汗以及对苏联同意越南占领老挝和柬埔寨

塞感到忧虑。他们希望苏联的注意力能为西欧、美国和大西洋联盟所吸引。他们有点担心美国将来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力量不够强大。

尽管有这些对外政策上的忧虑，他们还是把发展工业、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军队只居第四位，顺便提一下，这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一。

革命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一个改革时代。或者说得慎重一点：这是否是一个改革时代将取决于邓小平在体力上能坚持多久，取决于他驾驭不测风云能有多久。中国人将设法奉行一种同华盛顿和莫斯科保持等距离的战略。他们有时会向华盛顿亮出他们的俄国牌，有时又会对莫斯科打美国牌。无论如何是奉行一种等距离战略。

为了执行其经济计划，中国领导将使中国向世界经济开放。他们正在向世界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开放。中国是世界上唯独还没有被世界经济的混乱所席卷的大国。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同世界经济结构融为一体。现已开始的方针的改变虽然包含着一些风险，但同时使得它有可能迅速利用西方管理知识、西方专门技能、西方资本货物等等长处。

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最大得益者将是日本。日本需要石油，几年后中国将能向日本出口石油和煤。从日本引进技术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快。他们更愿意从日本引进技术而不是从美国引进，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人也许甚至愿意从欧洲或德国，而不是从美国买技术和资本货物。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年社会总产值人均约三百美元。但是在其他国家（特别在南亚）有好几亿亚洲人生活水平低于平均每人每年二百美元。身在美国的人认为，世界从经济上看是正常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它肯定是不正常的。今天有的地方比十年前更贫困。不言而喻，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国与国之间差别非常大。少数国家十分成功，但大多国家是贫穷的。

中国也许会在今后十五年取得巨大成就，至少它会走上这条道路。这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避免象“文化大革命”或“大跃进”那样严重的错误，或者避免过去二十五年里所干的其他蠢事。我对中国现在所做的事非常同情；我认为它的成功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中国在经济上越强大，苏联人就越不得不回首注视东方。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了。戈尔巴乔夫大概在这方面也要试一试他的风格，向北京作出友好的姿态。同样可以设想北京会做些友好的姿态，但接着人们就会想起，这只是在玩俄国牌而已。这一姿态是要华盛顿理解，比如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不要过分了。

我不会忘记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节日：邓小平作为最高司令检阅了规模非常大的军事游行。然后他发表了讲话，那是在从天安门广场通向昔日的紫禁城的高高城楼上。这是一篇十分简短的讲话，只有八分钟，语调和姿态有很强的军人风度。最后的几句话是：“我们刚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关于香港问题的协定。在香港的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对这项协定感到满意和自

豪……在国外的每一个中国人可以感到满意和自豪。”①（这些话当然是对台湾的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一千六、七百万中国人说的。）他最后说：“每一个炎黄子孙可以对此感到自豪。”从一位共产党政治家口中听到这些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啊！“每一个炎黄子孙！”从这里可以看到目前在北京充满了自信。

我希望他们能成功。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它的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中国至少在口头上将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的最重要发言人。但实际上中国人谋求同已工业化的那一部分世界进行经济合作。到世纪更迭的时候中国将是第三个世界大国，虽然不一定是超级大国——顺便说一下，中国人讨厌这个词。按他们的理解，“超级大国”这个词（以此指美国和苏联）是那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大国的标记。中国领导人断言，他们不会这样做。我估计中国至少在今后十五年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至于下一个世纪的情况如何，还得等着瞧。中国将成为第三个世界大国；中国已经是个核国家，它能摧毁华盛顿和纽约市，就如同能摧毁莫斯科或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城市一样。

当我们走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从两极（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实力态势变为三角实力态势作好准备。我们西方承认中国的崛起将会是明智的，其原因同理查德·尼克松就职后不久就同中国进行政治接触时一样。尼克松无论如何曾

① 这里引用的邓小平的讲话，与原文有出入。——译者

经是个好的战略家——我不想评价他在对内政策上的素质。从经济和技术上支持中国的崛起将是聪明的。对台湾提供援助时十分谨慎也是聪明的。

远东不只是由中国组成，日本也起着很大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取得经济成就的真正秘密之一在于：日本每年的防务开支只占其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而美国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则占百分之七，我们欧洲人约占百分之四。日本强大的竞争力和它的咄咄逼人的出口政策显然诱使美国人对日本施加压力，让它把自己的防务努力扩大为一种广泛的扩充军备计划。

但是，我确信，任何一种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尤其是在美国压力之下的扩充军备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会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国家感到不安。这样就有可能把中国赶回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日本的处境同中国的处境有某种相似之处：日本在这一地区也同样没有朋友。菲律宾、朝鲜、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日本帝国主义记忆犹新。日本在安全政策上依靠美国，它之所以必须依靠美国，是因为它既找不到盟友，又（由于麦克阿瑟将军确定的宪法）不可建立足够的本国武装力量。虽然日本能够而且应该为保护邻近其领土的海道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不应该要求它超越这一点。南朝鲜在东南亚也没有朋友。朝鲜人和日本人从来就不是相互钟爱的。南朝鲜和台湾的防务同样也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

远东的经济形势由于日本、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港的进步而显得很出色。但是，这些国家晚些时候还是可能受到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因此，不能过高评价它们的成就。日本是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其出口至今仍比有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联邦共和国的出口少一些。我提这一点，是要纠正美国报刊告诉人的关于日本贸易的虚假统计。但是，日本的贸易出超是个事实。日本人要是把他们的这种巨大贸易出超用来加强其发展援助就好了。特别在亚洲，他们可以以这种方式设法争取迄今所缺少的朋友。以日本的社会总产值衡量，日本的发展援助是非常少的——几乎象处于世界上最少者之列的美国发展援助一样少。如果日本人不是把他们产品的那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从而在一九八四年取得了相当于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的贸易盈余），而是更多地为国内需求生产，那么他们也将是明智的。例如住房建设应当大力促进，这是日本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世界的最重要部门。

不管怎样，使日本同西方紧密连结在一起是聪明的，东京是愿意如此的。因此，十年前法国和德国建议召开所谓的经济首脑会议时认为，从一开始就请日本参加是必要的。把日本看作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拒绝它，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和疏远这个很重要的远东国家是非常不明智的原因之一。现在，美国在远东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无论是欧洲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减轻这些负担。如果把日本推到同西方或者同其邻国关系紧张的地步，那将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暂试总结

无论我们看近东还是看拉美（特别是中美洲），或者是看远东，有一些基本的看法都是适用的（虽然先后次序和重要性不一样）：

第一：对于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来说，或者甚至对于整个西欧来说，要想象出一种纯粹是欧洲的、有希望在欧洲这些地区取得成功的总战略，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一项纯美国的战略并且由美国单独去执行，只会取得有限的成就，这是显然的。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就取决于对我们的经济潜力的巧妙利用。

第四：我们可以用军事手段阻止危险发展为战争，甚至发展为失败，但是，我们不能用军事手段缓和崩溃的、危险的经济形势；我们倒是必须设法理解这种形势。

第五：西方需要更多地理解世界其他地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经济状况和社会希望。这一点既适用于以色列，也适用于近东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一点适用于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拉丁美洲人的宗教、经济和社会渊源。这一点适用于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及他们的特殊的历史遗产。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要重犯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以及几乎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所犯的错误，即从纯粹以欧洲为中心的立场观察世界。这在目前意味着：我们不可从纯美国的观点，即以北美为世界的中心来观察世界。

北美与欧洲之间的合作越密切，就越有希望稳定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并通过这个来保持和平。整个西方同我上面提到的各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越广泛，就越有希望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它们的（从而还有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的康宁。

如果我们大家能就这样一种总战略取得一致，那么发生一场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定将减少，但这种可能性肯定不会完全从世界上消失。俄国人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压抑心理以及他们的扩张的总战略也不会消失。苏联将象过去一样利用这些地区的形势从中得利，不论在中美、南美、近东，还是以后在远东都将如此。它将试图潜入任何地方——希望有朝一日能从某个方面因势利导。因此，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野心，西方有必要保持警惕和军事上的均势。

但是，我们的军事努力不可损害我们的经济能力和效率；这种努力必须限于我们经受得住的范围内。西方民主的工业国家保住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最大希望就在于经济领域。是经济而不是武器库使西方最有希望获得成功。

第四章 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

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从许多方面说，这是一场结构性危机。对数以十亿计的人来说，这无疑就意味着萧条。某些地方有人认为，世界正处于经济高涨之中。这不符合事实。这仅适用于美国和少数其他的国家，但不适用于欧洲，肯定不适用于中美洲、拉丁美洲，不适用于整个非洲或亚洲，我在上一章提到的五个东南亚国家是例外。

结构上的变化首先是由越南战争以及不惜通货膨胀为它筹措经费引起的。第二，这引起了一系列美元危机，这些危机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使许多国家的政府摆脱了应当在执行其财政和货币政策当中遵守汇率与国际收支方面的纪律这样一条义务。每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其货币的固定汇率的约束和义务不存在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大坝也就垮了；甚至在工业化

国家中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也不是罕见的。

第三，欧佩克国家成功地利用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和一九七四年初的近东战争期间和战争后造成了第一次油价冲击，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造成了第二次冲击。六十年代初每桶石油约为一点五美元，几年前升到了约三十五美元，现在又低了许多。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二年间油价上涨二十倍，使全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出现巨大断层，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使许多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外国的资金。

越南战争结束于一九七五年。在近东，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延续不是太久，战争结束后很快重新开放了苏伊士运河。油价上涨的同时消费减少了，油轮和钢的需求下降了。这导致全世界钢和造船的生产能力的过剩。一九七四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造成了对钢、船等的需求的进一步下降。

在七十年代的起伏过程中（这也适用于今天），工业化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注意以前的经济目标的所谓神奇四角，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充分增长和对外经济平衡这四块基石。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家的经济没有一个能够同时地适当实现所有这四个目标。我不用再说第五块可能的基石，例如对社会公正的收入分配，或者第六块基石，如生态平衡。这一危机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

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某些工业部门受到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一九六〇年世界的年产钢能力为四亿五千万吨，在越

南战争和近东战争结束后，钢的生产能力增加到每年八亿三千五百万吨。一九八三年年生产能力为十亿吨，但其中只利用了百分之六十七。在以前的年代（一九六〇年或一九七〇年，或第一次石油冲击前不久，或在上述两次战争结束后），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分别为百分之八十三、八十五或八十六。目前，世界只需其钢的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在美国，一九八三年所利用的钢生产能力仅为百分之五十六；在钢铁工业曾是整个工业支柱的欧洲，一九八三年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为百分之五十九。就是日本人在一九八三年也只利用了其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二。后果到处都一样——不论是在匹兹堡、克利夫兰还是设菲尔德也好，也不论是在卢森堡或鲁尔地区也好。

造船业曾一直是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国民经济的一根强大支柱。一九六〇年，全世界造船厂建造了将近九百万总登记吨位船只；在两次战争结束时，一九七五年甚至造了三千五百万总登记吨位船只。当然，自那以来对新船的需求下降了。但是，可使用的船只数量增加为四倍，海运的总能力从一九六〇年到七十年代末增长两倍。在那两次战争期间，手头拥有的一切船只都使用上了；可是一九八三年有五千二百万总登记吨位没有利用，一九八四年甚至在一次有限的经济回升之后，还有三千五百万吨位未得到利用。现在有数以百计的船只和数以百万计的吨位闲置在港口。

谷物生产或整个农业生产是又一个失去控制的经济部门。例如欧洲共同体一九七五年生产了它所消费谷物的百分

之九十四，是纯进口者。一九八五年它生产了自己所需谷物的百分之一百零五，它成了世界谷物市场上的一个重要供应者。在此期间，美国的谷物生产和出口能力也增加了。因此，世界上就出现了粮食过剩。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在这段时间里都为本国农民提供了补贴，因而刺激了多余生产——这同补贴钢铁和船只生产一样。

这些只是较大的、较令人注意的例子。它表明了作为这个时期特点的经济结构断裂的规模。这既适用于国际收支和世界最重要货币之间的汇率，也适用于工农业产品的十分重要的市场。这种变化改变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结构和世界贸易的结构。

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席卷一切工业化国家，其中有的国家早些，有的国家晚些。例如瑞士在一九八二和一九八三年才出现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导致所有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如欧洲的增长率目前约为百分之二（顺便提一下，应当记住这个数字，以免被美国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所迷惑）。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世界贸易同样减少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的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世界范围内需求下降的打击。美国的高实际利率对全球的影响也促成了这种情况。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减少，因而生产资本货物和生产设备的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减少了。

这种经济结构变化的后果是出现了工业化世界三十年代以来所没有过的失业数字——这种数字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

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在政治上的含义是，以改变政治方针为目的的压力增大了；如果方针的改变毫无成果，那么人们就呼吁换一个政府。

在中左政府执政的法国，目前有些人倾向于选举极右派。例如一九八四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法国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选了勒庞。如果政府比中右政府还右，那么更多的选民就倾向于选举极左派，如一九八三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时有百分之七的人选了绿党。估计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有同样的趋势。随着长期失业者的比例的增长，这一趋势还会加强。

当然，在非民主国家中对经济下降的政治反应是另一个样。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军人政府企图占领福克兰群岛时，军事行动的目的大部分在于转移公众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的注意，以及防止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上的骚乱。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也许本不会产生，如果整个民族不受到严酷的经济压力的话——这个民族当时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伊朗霍梅尼声望的下降是经济因素起作用的又一个例子。再举一系列例子是不难做到的，但核心点可归纳为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结论：经济萧条越长久、越深刻，世界的政治不稳定就越严重。

美国的赤字是定时炸弹

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是一颗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的定时炸弹。这颗炸弹的引信虽然在某些地方暂时去掉了，但绝不是

永远地、完全彻底地拔除了。

在此期间我们又遇到了第二个定时炸弹。里根总统相当乐观地谈到了“第二次美国革命”。鉴于近几年美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膨胀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用外国资金维持这种膨胀，我倾向于对里根的经济幻影持怀疑态度。资本从别国的国民经济流向纽约市还能有多久？如果流向美国的外国资本的洪流干涸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股资本洪流甚至倒转了方向，那又将怎样呢？

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保罗·沃尔克（在我看来他是西方世界货币政策的杰出舵手）曾一再强烈地提出关于美国预算赤字的警告，这种赤字已导致过高的利息和过高的美元汇价，这种汇价自一九八五年年中以来一直高于合理的水平。沃尔克曾正确地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动用世界的积蓄，会对其他国家国民经济的内部发展起制动作用。沃尔克一再强调，美国正在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他说，美国借以满足自己的公家和私人的资本所需要的资本来源有断绝的危险；此外，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过度负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认为这都说得对，我相信，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这一系列问题，他也是正确的。沃尔克还完全正确地指出，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对市场的干预降低过高的美元汇价。即使这些银行卖掉它们的全部美元储备，它们也不仅会花光自己的货币储备，而且首先会对它们自己的货币和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通货紧

缩压力。一九八五年秋天，美元汇率的下跌虽然是由日本中央银行购进美元和美国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这两者相结合造成的；但是，现在日本中央银行卖出美元收进日元，从而使本国的货币供应紧缩，而美国国内增加货币供应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趋势。

因此，这种结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沃尔克是少数几个这样的美国国民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公开发表的观点不限于谈继续执行“赤字预算”所造成的国内后果。他的同僚中只有很少人象他一样试图向美国公众说明他们的预算赤字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里根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如果他们看到这种影响的话）倾向于采取不理会态度，而依赖他们国家的巨大政治实力抵御外来的经济威胁。

对于在自己的政府领导下形成的巨大贸易赤字和经常性项目收支赤字，里根总统毫无惶恐之色，这表明他对世界经济所负的共同责任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与此同时，里根总统主张减少联邦预算的高额赤字，这应得到积极的评价。可是，这届政府一九八五年提出的建议还是预计一九八八年之前的年度赤字为一千五百亿到二千五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作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假设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百分之四。不用多说，这是个乐观的假设；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都不会达到这种增长率。如果在今后几年出现了经济衰退，而不是所希望的持续增长，那么年度预算赤字毫无问题会增加一倍而达到四千亿美元。这一数字也许不是很可能的；因为在事态恶化到如此地步之前美国国会就会被迫采取

节约措施或提高税收。迄今所辩论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还没有生效。

在关于美国预算赤字的讨论中，迄今有一个重要之点很少为人们注意。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很容易用社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表示预算赤字。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美国当前和将来的预算赤字（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六）同其他工业国家的情况相比虽不算太好，但也不是特别糟。

然而，对于作出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预算赤字同一个国家的储蓄的比例。各工业国家的储蓄率差别非常大，而在美国是特别低的。只有把这两种数字相互联系起来，才能判断一个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用国家的储蓄弥补其预算赤字；或者政府为借款所付给的利息是否要比私人经济所愿意支付或能够支付的利息高。如果私人节省得不够，那就没有足够的储蓄可供政府和私人企业使用。如果政府尽管如此还不得不借更多的钱，那么所需款额就得由中央银行提供（它为此目的不得不印钞票），或者到国外去借。因此，私人储蓄率低的国家为政府提供信贷的余地要小于储蓄率高的国家。美国在所有大工业国中是储蓄率最低的；过去几年里，美国私人纯收入大约节省下百分之六，这个百分比大体上是稳定的（事实上在一九八一年采取减税措施后甚至下降了）。与此相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私人储蓄率为百分之十到十二，日本甚至达百分之十八。

就是说，假设这三国国民经济中企业经济的资本需求按百分比说大体相同，那么德国的预算赤字可以比美国高一

倍，日本的甚至可达美国的三倍，这是用赤字可动用的纯储蓄率来衡量的。一九八二年，日本的国家部门总共只动用了私人储蓄的将近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三年不到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八四年仅为百分之二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部门的信贷需要，在一九八二、八三和八四年分别为纯储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上和百分之二十以上。

同日本和联邦共和国的材料形成强烈对比，美国的国家部门一九八二年用了纯储蓄额的百分之七十，一九八三年同样是百分之七十，一九八四年约为百分之五十。

换言之，由于那几年货币发行银行在沃尔克主持下坚决拒绝用印钞票弥补赤字，所以国内积蓄只有小部分可用来满足工、商、建筑等行业的企业以及消费者和其他人的资本需求——对经济回升来说这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华盛顿必须从国外引进大量资本；与经常性项目收支赤字相应，一九八四年外借资本达一千亿美元，一九八五年为一千三百亿美元。因此，美国的外债在急剧增加。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在国外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在国外的财产。自一九八五年冬天以来，美国的纯外债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甚至高于巴西。虽然美国的经济比巴西的规模大得多，也强大得多，可是美国象巴西一样，不能再从其在国外的财产得到纯汇款收入。从纯数字看，它给国外债主的利息和给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多于从它自己在国外的资本设备中收回的钱。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汇往外国的纯汇款只能相当于

它的贸易与经常性项目的盈余。与巴西不同的是，美国目前没有这种盈余。它应当设法大幅度增加商品和劳务出口，它应当减少进口。首先，美元的汇价应稳定在明显低于目前的水平上，从而使美国出口的商品和劳务便宜些并增加竞争力，反过来使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目前由于美元汇价过高而便宜的进口货变得比较贵些。

一九八四年初美元汇价上升到可以换二点六马克，当时人们就认为美元汇价应有一个下跌之势。可是，自那以后却上升到可以换三点四以上马克（一九八五年三月），然后，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底起降至二点六马克左右。就是说，这样的调整还不够；不论以什么方式算，美元的汇价仍然定得过高。

这里再说一下，美元汇率过高的三个原因是：

第一，弥补美国高额预算赤字的必要性，使利率上涨。任何一个外国投资者把自己的积蓄或没有分掉的利润投入美国，而不是投入自己国内，他的投资都可以得到非常高的实际利息，这实际上是对向美国出口资本的强大刺激！

第二，美国私人资本市场上需求强烈。美国的公司目前可得到高额利润，这使它们能够支付高额利息，同时能分配高额红利，而美国的消费者可以从他的应纳税的收入中扣除他筹款购买新轿车或新电视机所付的利息——这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第三，日本、近东、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部分财产投放到美国，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经济会长期稳

定，把美国视为他们的金钱的“安全港”——或是由于美国政治稳定，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本国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不安全因素。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外国资本投入美国实际上都导致同样的结果：任何购买美国证券、股票或地产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元或马克在外汇市场换成美元。可是，因为沃尔克不印刷额外的钞票，所以美元的供应就跟不上。所以美元就仍然贵，汇率也就仍然高。

美国“赤字预算”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影响，迄今为止部分是积极的，部分是消极的。

积极的是：美国的赤字引起了美国商品需求的巨大高涨。这对日本和欧洲的出口业以及对这些国家和美国本身的就业形势都是有利的。在美国，需求的增加以及进口所造成的竞争压力，导致异乎寻常的企业生产能力的产生。与此同时，美国的雇员通过未预料到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而对经济回升作出了贡献。预算赤字成了经济的推动力。这一成就增强了美国的自信心。

消极的是：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利息太高。长期实际利息（即扣除通货膨胀率后的票面利息）在美国一九八五年春季平均为百分之八点八，在法国是百分之五点九，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百分之五点四，在英国为百分之五点三。因此，作为生产性资本的投资不足，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预期的利润低于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因此，欧洲资本货物工业的需求，尤其是建筑部门的需求不大，失业率太

高。

后果将会如何？对债务国的危险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对整个国际贸易的威胁也日益增大。美元所引起的汇价比例失调，导致了国际贸易越来越严重的失调。这又在几乎所有市场上引起相当粗暴的国家干预；由于有数以千计的国家补贴措施和保护主义措施，世界贸易已经有一半是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之外进行的。可是，如果美元汇价非常迅速地下跌，那么这会使国际贸易的情况完全反过来，使迄今有贸易盈余的国家的就业状况恶化。

芝加哥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勉强避免了迫在眉睫的破产，使人预感到另外一种危险。当美国政府为所有存款提供充分担保时，才恢复了银行用户（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人）的信任。但是，政府的这样一种反应也有可能来得太晚。同样可以设想，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会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不久前《金融时报》上有一个大标题叫作《有一天肥皂泡会破灭》。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希望不出现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府都必须为不出现这种情况作出贡献。信任的丧失会使人迅速抽回在美国的短期投资。一个投资者的担心会在几小时、几天之内传染给另外的投资者。

如果外国资金大量从美国抽回（实际上是私人和集体都拥向银行），这不仅会使美国银行陷于困难，而且会使美元汇价暴跌。欧洲、日本和阿拉伯的美元投资的市价会大幅度下降，日本人、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国外财产会大量减少。损害可能是没法控制的和没法估计的。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

性，即由于资本紧缺，美国的利率又向上升；这又可能引起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因此，人们只好希望情况逐步好转。可以在今后两、三年内通过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来做到这一点，赤字的减少会使美元汇价慢慢下降。减少赤字有三条途径：即通过提高国家收入，或通过削减支出，或把两者结合起来。如果国防预算（我认为它太高）和公共项目削减得不够，那么提高税收将是不可避免的。

减少赤字固然会削弱美国和世界的经济需求；而需求的下降既会使美元利息也会使美元汇价下跌。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商会因而受害，而美国的出口会增加。可是，利息的降低会使拉丁美洲有机会解决自己的利息负担。与此同时，利息低将使欧洲有可能在国内在更大程度上创造一种着眼于投资的就业形势。然后，一些欧洲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概就会有必要并且也有可能扩大它们自己的预算赤字，同时又不给自己造成危险。

可以设想，美国预算减少引起的世界经济的收缩会超过必要的（或经济上可承受的）程度。可是，如果华盛顿根本就不作出反应，那么世界将受害更甚。“预算外科医生”为拿起他们的手术刀所需的时间越长，手术就越可能进行得太迟。四十多年前在布雷顿森林开始实行的世界货币体系由于许多国家错误的预算政策而被破坏了，这已经够糟了。我们不可让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我们大家毕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的一部分。

关于“世界经济首脑会议”

亨利·基辛格在一九八四年底说过，美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基于美国的巨大经济实力，以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说不易受世界经济趋势的影响。他后来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要想克服世界经济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就必须放弃这种想法。基辛格说，美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它所具有的潜力都要求它毅然担当起领导的责任。

基辛格说得对。那些参加世界经济首脑会议的人将不得不告诉总统，在他国内确实有一枚定时炸弹在滴答走着；他们必须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帮助他拆除掉炸弹的引信。遗憾的是，一九八五年在波恩召开的首脑会议上没有接受这一挑战。这次会晤中关于世界经济的讨论由于公众对里根访问比特堡的争论而黯然失色，但这只是局部原因。近几年召开的任何其他一次首脑会议也都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十年前在朗布依埃由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经济首脑会议大概是最好的一次。人们在一间大客厅里相会，范围非常小。我们谁也没有打算向自己的电视台讲话，因为新闻记者和他们的话筒都不在场。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的伙伴身上，对他们说，听他们讲。大家怀着现在彼此能够较好合作的感觉离开了朗布依埃。在会议结束之后才通知新闻界，但他们并没有吃亏。

如今，数以千计的新闻记者来到会谈的现场，各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新闻发言人带着发言稿，时时刻刻都忙着找各自接近的记者，因此首脑们在作讨论发言时心中都装着加利福尼亚、法尔茨或巴黎的本国公众。

我清楚了解，本十年内经济首脑会议的成效下降了。但首脑会晤是能够有所裨益的。我们不一定需要同时变换我们的经济政策，但是它们应互相取长补短。光凭美国的乐观主义是不够的，尽管我乐意承认，悲观主义者同乐观主义者一样常常是不对的；不过，乐观主义者往往幸运得多。

美国喜欢在首脑会议上逼着增加世界自由贸易。欧洲人则倾向于作这样的回答：只要没有决心实行比较合于情理、比较稳定的汇率和比较低的利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新一轮会谈成功的希望就不大。

实际上双方都对，而一九八五年有过一个取得进展的特别机会，因为在这一年，七位与会的政治家没有一人面临大选。因此，这次错过机会未能在波恩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定意味着一次挫折。如果西方今后仍然没有决心掌握世界经济命运，那么西方的团结还将进一步减弱，我们今后同协调一致的总战略仍将相距甚远。

东西方贸易

最后谈一谈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长期存在严重意见分

歧的一件事。欧洲人不喜欢美国人利用贸易政策措施进行经济战的倾向。他们不赞成吉米·卡特对莫斯科的粮食禁运，也同样不赞成他在美国大使馆人员被当做人质拘留时对伊朗实行的经济封锁和其他制裁措施。里根禁运天然气管道原是要打击苏联，而欧洲人受到的打击更重，影响更久。欧洲人不想对莫斯科进行任何经济消耗战。

苏联肯定是害怕这种战争的。我不怀疑，苏联了解，它的经济能力一般地同西方相比、特别同美国相比，都处于劣势。但是，如果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全国说，俄罗斯母亲在危险中，西方企图在经济上把俄国逼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勒紧裤带，那么他们是会这样做的。俄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有时他们似乎简直是甘心受苦。只需读一读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能理解这一点。这说明，没有可能对莫斯科打赢经济消耗战。

美国对苏的大多数贸易限制都是先宣布而后又废除，它们对欧洲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大于对苏联经济的损害。这种战略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欧洲盟国不会同意这种战略。几百年来欧洲人一直同俄国人做生意。他们认为，同近邻做生意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有好处，即使贸易额很小也罢（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苏联两亿六千五百万人民的贸易只及同七百万奥地利人的贸易的一半）。欧洲人同苏联有贸易协定；德苏经济协定的期限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他们希望这些协定得到尊重。他们也期望美国尊重其盟国所缔结的条约。

在这一章结束之时，我想再回过头来谈谈特别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美国的高额预算赤字。政府就象一辆手推车：只有你确实推得了这一辆手推车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如果美国的公民懂得，他们的赤字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余国家确实有害，那么他们就应该稍稍推动一下他们的政府和国会。要控制住赤字，道路将是漫长的，陡峭的。

第五章 意见一致和领导的决心

在上一章里我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除掉这一特殊的（我希望是暂时的）情况，我非常相信美国具有领导的能力。美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有生气。需要它慷慨时，它就会是最慷慨的国家。它推行它的政策极有魄力，而且它还具有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有时倒使我们这些审慎好疑的欧洲人觉得天真难办，但是对美国人显然有益。

美国总统在许多方面还有机会作出新的开端。一九八四年底他获得极大授权。在某些方面作出新开端实在是必要的，而且我认为也是可能的。根据我同四位美国总统合作的经验，我可以对新的倡议的产生大胆地作这样的预测：在第一阶段，政府和国会、州长们和教授们以及整个公众将会对分析和意图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他们也会相互误解。辩论将异常热烈，日本和欧洲都没有人明白，这一切会导致何方。

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结局难以预料。

但是第二阶段接着就开始了。突然间，美国独出心裁地对挑战作出回答，提出怎样补救和改进的主张。

美国过去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思了联合国。它就是这样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同发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这样在杜鲁门领导下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于六十年代初设想出了肯尼迪回合，缔结了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在此以前曾对是否建立一支多边核武装力量进行长期辩论，显示出相反的方向），最后在尼克松领导下提出了标志着裁军谈判突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那么紧接着就是保持很短时间的第三阶段：华盛顿将要求它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效法它的榜样。如果日本人、欧洲人或俄国人需要时间多一些，而不只是几个小时或几个星期，或者如果他们只愿接受美国计划的一部分并要作一些补充，华盛顿就会深感失望。

确实，无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或是美国的其他盟国都没有授权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提出这样一些倡议。但是几十年来我们大家几乎都知道，仅仅由于美国的幅员广大及其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强大这一点，每一位美国总统实际上就是西方世界的突出领导人。

美国总统可以是一个完美的领导人，也可以是一个合适的或糟糕的领导人。这取决于环境和他的品格；这也取决于

总统必须与之共事的那些人的品格，取决于在盟国或友好国家，或在苏联掌权的那些人的品格。华盛顿越少仗恃十足的霸权主义和实际的优势，越少摆出有权指挥全家的“老大哥”的架子，其他那些政治家就越会乐意同美国总统合作。

但是美国需要整个家庭。只有在以下两个地理战略领域，美国可以希望没有盟友的合作也可以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是相互的洲际核威胁和反威胁，也就是通常说的战略威胁；另一个是从地理战略上看狭小的中美洲地区——巴拿马地峡以及也许还有加勒比的部分地区。

然而，在其他许多地理战略地区，美国却不能希望没有其他西方国家的热心合作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繁荣和阻止苏联插手该大陆是适用的。美国单枪匹马不能够保证拉丁美洲的和平。它也不能够单独排除债务危机。

这同样也适用于黑非洲。危险的种族冲突，尤其是在南非的种族冲突，不是美国单独所能解决的。还有近东的冲突——从塞浦路斯到巴基斯坦、从阿富汗直到非洲之角的冲突，特别是以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约旦为一方和以以色列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美国能够单独解决的。

远东的情况也相似，即使在形式上和缓一些，因为美国在那里还能够单独保持一定时期军事均势。但是，它昨天既不能拯救柬埔寨和老挝，今天也不能独当一面地有效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局势。

虽然西欧国家和加拿大同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密切的盟友

和朋友，但是，美国却不能控制加拿大的或者西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如果欧洲人不自己承担这一负担的大部分，那么北美人就不会希望保卫北大西洋的彼岸。

至于美国对苏联采取的“总战略”，如果没有对苏联扩张野心也感到不安的其他许多国家的战略合作，要遏制苏联对相邻的三大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扩张野心，对美国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

初看起来，由于莫斯科对其大多数卫星国和盟国近乎专制的霸权，苏联总战略的独立性比美国似乎要多。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苏联虽然不得不在十分狭小的天地里行动（例如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即使这种状况是它自己造成的），但是与美国相比，存在着重大差别。苏联可以单方面地、只在政治局的范围内为其联盟作决定，而美国必须通过主权国家之间自愿的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过程。

对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如果美国不是同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密切合作，那么它就不能实现它自己的持久的经济繁荣。

我再强调一次：除两个特殊情况之外，美国如果不同其他国家联盟与合作，就不能够成功地维护其边界以外的战略利益——就其经济而言，甚至不能维护其边界以内的部分战略利益。在个别情况下，单干的想法或者孤立主义的想法对某些美国人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类想法总是导致失败和损失，而且正是在美国维护切身利益的那些领域。

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彼此不同的，在

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是互相抵触的。其原因在于各国的地理处境不同、国家的大小不同、经济发展或经济成就的程度不同、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最后在于因此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西方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庭内的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公正的妥协——并且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不断地这样做。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各国不同的目标协调成为朋友和盟友的共同的战略，而同时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竞争者。

在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国家集团，它们（虽然呆在一旁避开大的权力斗争）必须彼此之间以及同其他国家，至少同它们的邻国达成妥协。这涉及一百多个不结盟的中立国家，它们在局部的区域性的、有时甚至是在全球的一级，各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必须要做的类似事情，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就是这样。

今天世界上最多只有一个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不依靠盟国的合作而追求本国自己的利益。但是在中期内，也许在十五年内外，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说法也只有在中国的地理战略利益相当有限的条件下才是对的；一旦它的利益超出这一界限，中国人也不能再独行其是。

开头我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来看世界。现在我打算从欧洲盟国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对欧洲主权国家来说，它们可以追求本国利益的前途是很狭窄的。只有通过密切的合作和联合行动，它们才有希望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成

就。这一点对英国也是适用的，虽然英国的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大概还需要许多时间和进一步的反面经验才能理解和承认这个事实。欧洲经济共同体当然是最重要的合作组织。即使是在这个组织之外的国家，如挪威、瑞典、芬兰、奥地利、瑞士和南斯拉夫，也只有在同欧洲共同体密切合作，以及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密切合作的时候，才能使经济繁荣。

所有欧洲国家都比美国更多地依靠进出口。它们都需要同美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差不多四十年前人们已经清楚认识到，西方国家为确保自身的经济繁荣必须相互进行紧密合作。在当年起草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人们补充了一个条款，它明文规定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是条约的义务，也就是北美和欧洲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义务。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欧洲国家还不能够单独自卫对付苏联的核威胁。为此它们需要美国盟友。为了使莫斯科相信美国对欧洲的核战略防务承担了义务，欧洲人依靠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但是，欧洲没有一个政府相信，核危险是当前已出现的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在联邦共和国，只有绿色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认真相信这一点。前已指出，欧洲各国政府认为，参与为拟议中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发展新技术是不明智的。但是，欧洲国家政府对公开表示怀疑显得犹豫不决，因为它们不想使美国政府陷入窘境。

虽然广大公众担忧，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

后果，但各国政府更害怕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导致进一步忽视我们共同的常规防御。

欧洲人最害怕俄国人方面的（也许是针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压力和讹诈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用常规武器来衡量欧洲盟友无疑是有潜力的（即使要美国只给予象征性的支持），可以顶得住苏联在政治上对西欧施加影响或者进行统治的任何压力或企图。它们也完全有威慑潜力，使莫斯科不敢仿照阿富汗、越南或柬埔寨的办法用常规武器进行侵略。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西欧没有潜力，而在于西欧两个最大军事强国之一的法国没有让它的部队和后备兵力听从北约的共同军事组织、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命令所调遣。如果法国这样做了（这既符合它自己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人和美国人的利益），那么（必须再说一遍），最高司令的职位必定会由一位法国将军担任，而不是一个美国人。那时，驻欧美军的兵力就可以大大减少。但是目前这一切还都是主观愿望。现在，欧洲的防务需要美国大力参加。

至于世界其他地理战略区域，欧洲人除了同美 国 合作外，不可能采用别的办法来大张旗鼓地谋求自己的利益。只有同美国在一起，欧洲人才能使波斯湾到欧洲的海路保持畅通。但是既然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一群疯子把油田变成火海，因此欧洲人也同美国人一样关注近东，也就是说，哪里出现有限的战火，就在那里维持均势并扑灭这团火焰——而在世界的这个不稳定的充满矛盾的地区将会烽火连绵。

把所有这些总结一下，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人对美国人的依赖大于美国人对欧洲人的依赖。由于中国的崛起，他们双方也许有朝一日由于全球力量结构的未来变化而减轻负担。这将使西方部分地摆脱俄国的威胁；但是，我们不放松警惕，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吗？

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下面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即：开放的社会、国家的民主结构、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不管这种观念在耶鲁、牛津、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或希腊作何解释，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都不会显出重大差别。一些共产党专制国家不懂得、也根本不会接受这种价值观；相反，我们的价值观总是受到这些国家专制及其扩张野心的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制止它们的扩张主义。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我们一定要吓唬住苏联使之不敢侵犯我们或我们家庭中的个别成员——而且首先要通过保持足够的常规武装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唯一能够实际使用的军事力量是常规武装力量。

其次，西方必须以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吓住东方。但是我要提醒：在中欧战场仅仅使用所谓的战术核武器就意味着一天之内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这不仅会摧毁我们想要保卫的东西，甚至中欧常规武器防御也会因而崩溃。美国当前那种把军事计划几乎只集中于核战争的趋势使我非常反感的。常规战争即已足以令人毛骨悚然（我参加过五年多常规战争）。重点宁可放在打核战争上，作为战略上的轻重缓急

的安排，是根本错误的。

在“总战略”的最高一级，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是联盟的团结，这也意味着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其次是对苏联采取一个共同的总战略，如果我们在头一个要点上失败了，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联盟一九六七年年底在阿麦尔主持下商定的共同的“总战略”至今还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要坚持皮埃尔·阿麦尔的双重战略思想，那就必须在欧洲继续三个进程。第一是赫尔辛基会议的进程，这一进程现在随着美国、加拿大继续积极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而得到进一步的动力；第二个进程是西欧经济机构、尤其是欧洲共同体的进一步一体化和进一步加强；第三个进程在最近两三年停滞了，这就是西欧防务进一步一体化，换句话说就是塑造西欧在防务上的特性。

至于核武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敏感的僵持局面的时代。双方拥有的武器都能保证使对方的武器用不上。我认为，双方的这种威慑既非不道德，也不是不合逻辑。尽管存在着严重的东西方危机，这种威慑仍长期地保证了核和平。但是相互威慑也许不能永远确保和平——而在这后面正在出现大规模核毁灭的深渊。

因此我热切盼望减少核风险。我并不要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但是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减少西方对核武器的依赖。我支持那些有战略头脑的人，他们主张大西洋联盟发展一种放弃任何“及早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当然这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和条件，这就是重新分配现有预算资金和人力资源，

提高我们进行常规战争的能力。我们必须有效地组织和利用西欧现有的后备兵力。这归根结底也将扩大法国和法国武装力量的作用。

欧洲人至少同美国人一样关心制止军备竞赛。控制军备竞赛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必要的。仅仅这一个题目就值得写一整本书。在这里我只能谈谈技术细节之外的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军备谈判意味着同苏联合作。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要坐在谈判桌旁，否则他就欺骗他的国家和世人。限制军备就是同苏联合作——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第二，不要让人诱惑而去进行军备竞赛，达到从经济上消耗苏联的目的；

第三，只有在谈判双方明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限制军备谈判才能实现其目的。如果一方能够单独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么人们就不必商谈限制军备了。理论上可以设想的一方的任何“绝对安全”都意味着其他各方的不安全。而且“绝对安全”也只是在研讨会上的设想，而不是在世界上作为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中，限制军备需要那些为缔结条约而相互谈判的人们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伙伴关系。

假如条约最后要议会批准，那么条约必须是协调、均衡的，这就是说：对方所得不可大于我，我之所失不可大于他。因此，只有在谈判中自始至终都有保持均势之意，才能就军备限制或军备控制达成协定。即使在此之后，要说服本

国的公众和议会，使他们相信已达成的条约（无论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是其他任何一项条约）确实保持了均势，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为什么近十二年多以来已批准的条约进展如此之小，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事先花言巧语，夸夸其谈，因此在谈判后很难使议会和公众相信已达成的条约是公平合理的。

为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必须避免相互谩骂和侮辱，而要求双方建立信任。目前，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两个超级大国今后两年内在它们的日內瓦谈判中有大于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取得一些初步的和部分的结果。但是，与此同时还应在一系列经济问题、贸易问题以及文化交流方面争取达到关系正常化。我支持阿斯彭国际组织的声明并强调指出：遏制并影响苏联的势力需要西方有实力，团结和坚定不移。但是遏制战略需要的不是同苏联对抗，而是持久地同苏联接触。

一项共同的总战略必须包括许多方面和成分。它既不局限于军事组织和军事上的自我炫耀，也不限于购置武器或进行军备限制谈判。总战略也叫做：总的外交手段。

购置武器同外交几乎毫不相干；这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战略。一种相互关联的西方总战略应当包含经济政策——既包含我们阵营内部的经济政策也包含对苏联的经济政策。它既包括针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的经济政策，也同样包括针对那些被争夺或受威胁的地理战略地区的一致

的经济政策。关于这些地区，我在第三章已作了概述。

缺乏领导

目前西方世界没有这样一种协调一致的战略。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绝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这种缺乏是由没有领导决心产生的。欧洲同美国都是如此。自实行欧洲货币体系和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几乎再没有真正的进展。因为欧洲没有团结，所以欧洲目前在所论述的一切领域都没有行动能力和领导能力。

由于美国的强大，由于它的生机和活力，由于它具有两亿三千五百万组成真正的、而不是号称的共同市场，而且只有一种货币、一种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以及由于它那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的领导只能来自美国。但是美国对要作为领导没有准备，倒是孤立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霸权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倾向在相互争夺优势。

但今后不一定永远如此。

从哈里·杜鲁门、乔治·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从艾森豪威尔的实用主义、肯尼迪的想象力、尼克松杰出的战略判断力和决断力中，屡屡产生西方世界的领导。我不怀疑这种情况今后会再次到来。在自由的、具有民主宪法的国度，施行领导无疑既需要构想力也需要有取得折衷一致的意愿和

能力。

取得一致意见是可能的。因为尽管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大家都从原则上相同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基础出发处理事情。我们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对开放社会和法治的必要性这些信念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追求公正、团结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愿望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责任意识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的政府只有在采取行动的时候，而不是发表那种适应当时公众意见的策略性公报的时候，才能胜任它们所担负的责任。

第六章 对一种“最佳情况”的设想

在西方，各国政府和公众目前所考虑的都是对最坏情况的设想。我们用了极其大量的时间考虑会出现的最坏情况。这种做法不仅转移了我们对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的注意力，而且还诱使我们考虑采取极端的或者不现实的解决方案。这种考虑最坏情况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如欧洲和平运动、苏联对西方的宣传以及美国白宫。

比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就是试图对一种“最坏情况”将危及他自己的国家这一固执的想法作出回答。这里的“最坏情况”就是指对美国发动一场洲际核导弹攻击。现在还根本不清楚，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能不能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安全。但已清楚的是：这一计划不会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不会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就是说：这一计划最多也仅是个局部答案，仅此而已。

现在是西方领导人共同考虑答案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回答各种可能的情况中一个小小的切面的问题，也不仅是回答一种关于（极不可能的！）最坏情况的问题。现在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并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智力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可能性，去接近一种可想象的“最佳情况”的时候了。

要想使整个世界维持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均势，那么第一，西方需要在已结成联盟的欧洲人、北美人和日本人之间有内聚力；第二，西方需要有不仅是对付苏联扩张主义、而且也是关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繁荣的共同战略；第三，西方需要一个关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的方案。为此所必需的要素没有一个是不可以达到的，也没有一个是必定会同其他要素发生冲突的。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意见一致的程度日益变少了。现在是各国领导人重新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的时候了。下面我想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单。在这些建议中，有些前面已经提到，有些新增加的建议在前几章中没有提及。我认为，这些建议（假如被采纳并付之实施）合在一起就是对当今西方总战略的最佳情况的设想。

关于联盟

1. 我们重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决议的双重战略思想，这项决议是由约翰·菲·肯尼迪、皮埃尔·阿麦尔及其他一些人作了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

我们始终主张联盟的两个“主要职能”，即：

- a) “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政治上的团结……以便对侵略和……压力产生威慑作用，并在出现侵略时保卫成员国领土”；
- b) “继续寻求朝着同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家建立持久性关系的方向取得进展”。

2. 我们重申肯尼迪的方案：我们的团结应当同时建立在美国和欧洲这两根支柱上。我们认识到日本这第三根支柱的必要性。事先不同盟国磋商，我们任何人都不在外部安全方面采取重要的步骤。
3. 我们呼吁法国为了欧洲前沿防御这一目的改组武装力量，特别是常规武装力量和预备力量。应当同西欧其他武装力量一起并在一位法国军官统率下做到这一点。

对苏联

4. 我们不寻求优势，而是要在欧洲保持军事力量的稳定的均势。
5. 为此目的，我们将适当改变我们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及其结构和装备，以致不必由我们作出事实上的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而倒是苏联今后要作出这种首先使用的决定。
6. 同时我们谋求通过在以下五个领域的谈判及军备限制条约建立一种稳定的安全均势：

△在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
△在欧洲的核武器，包括中程核武器；
△洲际核武器；
△太空基武器；
△在上述所有领域里达成建立信任的协议。我们当然不会缔结那些无法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手段核实或是检查其遵守情况的条约。

对第三世界

7. 我们承认并尊重任何一个国家决定实行的真正的不结盟。
8. 我们提供经济援助，以便创造使第三世界可以接受的、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的经济条件。我们这样做既是出于道义的原因，也是为了使苏联共产主义不可能利用有损人格的生活状况。因此，我们将继续并加强我们的发展援助，尽管苏联总是不参与提供援助。
9. 同时，我们呼吁第三世界国家：
 - △明显地减少如今高于所接受的发展援助许多倍的军费开支；
 - △将其国民经济向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开放，以便造成技术和生产资本的广泛转移。
10. 我们将不妨碍发展中国家实行控制生育的政策，并支持计划生育方面任何一种伦理上可行的办法，以避免人口爆炸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

11. 我们一起按照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向中美洲国家提出建设有生存能力的国民经济的里根计划，这一计划应使这些国家的人均社会产值在七年内增加一倍。

12. 同时，我们将首先通过我们的财政部长起草一项排除债务危机这颗定时炸弹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债务国也好，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这样一些债权国也好，都要对两次石油冲击之后出现的局势负责。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总的原则协定（贷款总协定），这项协定应包括在多年内为债务提供优惠条件并使每年的转汇款额具有可预测性。

关于我们的经济问题

13. 最近我们将采取以下一些相互补充的步骤：

a) 美国将减少其结构性预算赤字，在一九八六预算年度减少大约五百亿美元，在一九八七预算年度再额外地减少五百亿美元；另外它将从税收方面刺激私人节省开支，以降低市场利息和美元汇率；

b) 同时欧洲国家将增加自己的国家开支，而且主要形式是减少税收，以便至少部分地抵消可预见的美国需求下降的影响，并解决失业进一步上升的问题；

c) 日本也将采取同样的做法；此外，鉴于日本军事开支几十年来一直很低（今后也将保持下去）它将迅速增加其发展援助，这样做也是为了使日本

的国际收支更好地趋于平衡。

14. 我们承担义务，从现在起就不提供任何一种额外的出口补贴或不阻碍进口，并且不去推行其他任何形式的附加的贸易保护主义。
15. 我们将共同主张召开新一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谈，我们估计这一“里根回合”的谈判将持续好几年。
16. 同时，我们每个国家本身都将在国家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一连串步骤，在较长时期内使我们自己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因为我们认识到，近十二年来汇率出现的在以前的世界经济中从未有过的过度波动，是国际价格结构和国际竞争能力发生畸形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原因。我们知道，如今已不能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外汇市场的干预迫使汇率趋于稳定，而是需要制定一种各个国家的旨在实现和保持经常性项目收支平衡的经济总政策。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在这一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谈结束之前最好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
17. 不管上述情况如何，欧洲国家都将加强欧洲货币系统和欧洲货币结算单位的作用。北美国家和日本都期望在中期内由此而有可能在美元、日元和欧洲货币结算单位之间建立一种基本上稳定的汇率，而且这些国家本身也愿意为此作出贡献。一切有关国家都知道，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标，那后果必然是再次使国际贸易

易中的货物和原料价格出现新的失调，使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受危害。

18. 我们都承认，在我们克服了目前的危机和结构性变化之后，在世界经济中充当纯资本出口国对于所有先进工业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使第三世界受益，也是为了使自己赢利。

关于环境

19. 我们认识到了许多危害自然环境的现象：在萨赫勒地区，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森林以及在中欧的森林里都有这类现象；大气层的变化日益加剧，地下水的质量也在恶化。所有这些危险光靠一国的手段是不能充分遏制的。因此我们主张对原因及相互影响进行共同的科学总结和研究。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对此进行观察和分析；为此必须让所有的国家参加，不论其政治制度如何，不论其是否结盟，也不论其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

当然我也知道，西方世界的国家与政府首脑对于这样一个广泛的议事日程没有准备。他们现在很可能对其中的哪一项建议也不能取得一致。这份建议单当然可以大幅度改动，既可以只要其中的几点，也可以再增添其他一些重要的建议。

七十年代的头几次首脑会晤也没有讨论过如此广泛的议

事日程；但那些会谈是以非常广泛的方式进行的。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已经今非昔比。现在必须敦促西方世界的国家领导人不仅要共同地解决当时紧迫的日常问题，而且还要共同地把注意力放在本质性的问题、重大的问题上。

上述十九项建议中，没有一项建议是乌托邦式的。要西方世界的国家领导人研究一个如此广泛的一揽子方案，难道一定是一个如意算盘吗？一九八六年他们在东京会晤时就将再一次有机会；他们在今后的岁月也有各种可能。但是，如果他们把时间仅仅耗费在眼前紧迫的日常问题上，那他们就可能拿我们的前途当儿戏。

跋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动荡不定的时代，无论从国家方面还是从国际方面来说，只造就了为数不多值得注意的或者说非凡的国务活动家。我认为，本书作者——从一九七四年春至一九八二年秋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是最应得到这种称誉的人。

在这几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样，从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角色成长到担负与自己的地理位置、经济重要性和内政稳定相称的角色。其原因主要在于施密特在一系列对西方联盟和全世界具有极大意义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七十年代，在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而脱出常轨的时候，一种领导的角色落在了多年来坚定拥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张西德同西方防御联盟一体化的这个人身上。施密特加强了欧洲在常规武器防御和威慑方面的份量。他先后担任

国防部长和总理，在把联邦国防军扩建为有效的防御军队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人。联邦国防军有了对付危机情况的强大后备军，但它仍然是一支不会产生任何进攻性威胁的军队；按照在伙伴之间达成的防务加对话这一长期有效的大西洋公约组织双重战略（已写进了一九六七年阿麦尔报告），施密特支持并继续了他的前任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扩大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加强了同苏联的贸易。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把熏熏欲燃的通货膨胀之火点燃并引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经济衰退，身为经济和财政部长，而后出任总理的施密特的经济政策证实为坚定稳健的楷模，被一致公认为比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策都有效，可能只有日本除外。

鉴于汇率变动不定，推迟了持久的经济恢复的到来，鉴于联盟的天然的领导大国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他看来有不足之处，施密特于一九七九年同他的法国伙伴、后来的朋友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合作，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自此，它至少缓和了货币波动对大多数西欧国家造成后果。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当联邦共和国成了肆无忌惮的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时，施密特有勇有谋地解决了一系列令人焦急的危机，以此向自己的同胞和其他世人表明，德国人今天可以对付这样的威胁，而又不限制或放弃自己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在施密特担任总理的后几年，他在某些政治领域遇到了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和误解。他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友好，而他同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根本没有过不复杂和信任的关系。由此而多次产生紧张关系，对于一个总是要求自己及其同事发挥最大效能的人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在施密特任总理的最后几年困扰着他的激烈争论有：

——一九七八年中子弹失败。在施密特只是勉强地赞成中子弹以后，卡特放弃部署；

——在欧洲部署美国新的中程导弹作为对苏联的SS—20导弹威胁的回答。最初，他站在那些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果断对策的人的最前列；后来他对美国人进行减少中远程导弹谈判的方式产生了怀疑。一九八二年夏，里根总统作出不采纳美国谈判代表保罗·尼采的折衷建议（所谓的林中散步公式）的重要决定，没有同任何一个欧洲国务活动家磋商；

——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九八一年在法国大选中令人失望地败北，影响了无与伦比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德法关系。这种关系是他和吉斯卡尔发展起来的并导致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新联系。在施密特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当然不以牺牲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为代价——是加强西欧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地位、从而使欧洲真正成为联盟的两个支柱之一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在伊朗革命后产生的经济后果。

虽然德国的政治在他的领导下具有很稳定的特点（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同美国的形势不同），但是，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的经济衰退因其他种种困难而更为严重，破坏了人民对他的支持，摧毁了他的党同自由民主党的联盟。联盟分裂了，总理在议会失去了多数和政治领导权。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一度显得精疲力竭的赫尔穆特·施密特辞职，把总理职位让给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施密特一九八三年宣布，他将在下次大选时结束他在联邦议院的三十年议会生涯。但是，不久以后事实表明，在相应的八年内塑造了德国政治的这个人物并没有沉默，他在自己的国家仍然是最有威望的政治人物，在欧洲乃至西方，如同他的朋友吉斯卡尔·德斯坦所说，是“最受尊重的德国人”。

施密特在本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一九八三年秋，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中心邀请他去亨利·R·史汀生讲座讲授，这是耶鲁大学最有声望的讲座。我作为耶鲁大学的理事和这个研究中心的朋友，以威廉·F·福尔茨主任的名义向赫尔穆特·施密特转达了这次邀请。

威廉·P·邦迪①

① 威廉·P·邦迪，从一九六四——一九六九年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司副司长，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三年为《外交》季刊杂志的发行人。——译者

本书产生的过程

威廉·F·福尔茨①

过去耶鲁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中心邀请过公共生活的一些学者和名人来耶鲁大学为史汀生讲座授课。但是，没有一个报告人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前总理施密特这样引人注意和使人感兴趣。听课所需要的礼堂逐次加大。这种热情首先是基于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国际声望；其次是因他的政治能量以及他提出系统主张的力量和把复杂的关系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的能力。他的吸引力在于，他自己曾把一些主张变成政策，并且对错误的主张在使用现代国家的权力手段时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他有清楚的了解。

施密特于一九八五年春在耶鲁大学作了讲演。为了以书的形式发表，他对所讲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加工整理并扩充了

① 威廉·F·福尔茨，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译者

内容。这里提出来的文本也包括对若干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在施密特报告后紧接着进行的长时间热烈讨论提出出的。最后一章阐述的十九项建议已在一九八五年五月《时代》周报上第一次发表。